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2年3月号

金融与发展

人民币的崛起?

宏观审慎政策入门

赋权于妇女

大卫·布鲁姆论“Y一代”

年轻人要求变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Jeremy Clift

主编

Marina Primorac

执行编辑

Camilla Andersen

Natalie Ramírez-Djumena

Hyun-Sung Khang

James Rowe

Karen Ongley

Si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Glenn Gottselig

Maureen Burke

Lika Gueye

Jacqueline Deslauriers

助理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Seemeen Hashem

美术设计

Sara Haddad

媒体经理

Nicole Braynen-Kimani Lijun Li

高级编务助理

Harris Qureshi

编务助理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James Gordon

Nicoletta Batini

Thomas Helbling

Helge Berger

Laura Kodres

Tim Callen

Paolo Mauro

Paul Cashi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drienne Cheasty

Paul Mills

Alfredo Cuevas

Martin Muhleisen

Marcello Estevão

Uma Ramakrishnan

Domenico Fanizza

Abdelhak Senhadji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12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5 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12年3月号·第49卷·第1期

特辑

青年寻求发言权

6 前途未卜的年轻人

感到受挫和愤怒的全球青年要求实施变革

大卫·E. 布鲁姆

12 提高教育水平

改变年轻人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是帮助他们及其所在国家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伊曼纽尔·希梅内斯、伊丽莎白·M. 金、谭吉平

15 受伤的一代

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大幅增长，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才会降低

汉南·摩西

18 直言不讳：幻灭的理想

世界经济的复苏能力将决定当年轻人们的未来命运

玛特·沙菲克

20 青年之声

全世界的年轻人直言不讳

希沙姆·阿拉姆、黛瑞尔·斯多—苏斯科、芭芭拉·弗雷泽、杰克琳·德斯劳瑞尔、朱利安·莱亚尔、威尔·法塔德和图鲁·欧甘勒斯



本期还有

26 人民币能否称霸世界？

虽然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正变得日益重要，但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对美元构成挑战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叶雷

30 整体性保护

不仅需要保持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而且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更为广泛的“宏观审慎”方法，以保护整个金融体系

路易斯·I. 杰克姆、俄尔恩德·W. 尼尔

34 评级博弈

监管部门无可选择，民间信用评级大展身手，履行公共职能

帕纳伊奥蒂斯·贾华士

40 赋权于妇女是明智的经济学

缩小性别差距不仅能造福于妇女和儿童，而且整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阿娜·雷文加、苏德·薛提

44 图表释义：摆脱贫困

拉丁美洲的贫困率正处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

艾丽西亚·巴尔塞纳



登录 www.imfbookstore.org/f&d 订阅

年轻人呼吁改革

年轻人是这次全球经济衰退中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现在，他们直言不讳，要求改革。这些在此次大萧条中逐渐成年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工作年限的延长、就业机会锐减以及黯淡的经济前景都使其受到重创。有人称他们为“iPod一代”——没安全感 (insecure)、压力大 (pressured)、负担重 (overtaxed) 以及债务缠身 (debt-ridden)。然而，不管是否有安全感，全球青年的现状正挑战着现有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似乎已经击败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 (Angel Gurría) 说：“年轻人需要一个更公正、更公平、更具人性化的世界经济。”

大衰退对不同年龄的人都造成了很大伤害，只是方式不同。对于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来说，大衰退实质是一场财富危机。这代人本来希望能顺利退休，但是却经历了自身财富 (财产和储蓄) 急剧缩水的情况。对于被称为“X一代” (生于1965—1980年) 的人来说，大衰退是一场收入危机。他们本应该处于人生中收入最高的阶段，但经济的衰退使其收入锐减，并威胁到他们的退休金。而对于被称为“Y一代” (生于1981—2000年) 的人来说，大衰退使其未来飘忽不定，并使婴儿潮那代人留给他们的潜在的遗产受到影响。

近期的《金融与发展》关注了老龄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不平等现象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本期的

重点是年轻人面临的挑战以及为其创造就业机会的迫切需要。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 (David Bloom) 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强调倾听青年心声的重要性。本期的其他文章还讨论了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的需求、发达经济体的青年受到危机的影响以及IMF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们选取了六位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向读者展示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及危机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本期《金融与发展》还采访了弗雷德·伯格斯坦 (Fred Bergsten)；探讨了人民币的崛起；关注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了如何加强妇女的权利；介绍了对金融稳定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

此外，对于那些想要更好地了解宏观经济基础概念的人，我们向您推荐最新推出的“返归基础”专栏。我们将该专栏的所有内容汇编在一起，您可登陆 www.imf.org/fandd 查看。

最后，我们对原IMF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沙 (Michael Mussa) 的逝世表示哀悼。穆沙是个睿智、犀利的人，享年67岁。他曾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91—2001年，他担任IMF研究部的经济学顾问和主任。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主编

46 全球土地热潮

外国投资者大举购买发展中国家的耕地
拉巴赫·阿尔扎基、克劳斯·戴宁格尔、哈里
斯·赛洛德

50 另一货币联盟剪影

在变革中发展将帮助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经受住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
阿尔弗雷德·希普克

52 壁垒将要倒塌

阿蒂西·雷克斯·戈什访问IMF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

其他内容

2 经济学人物

美籍全球主义者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C. 弗雷德·伯格斯坦的采访

38 返归基础

何为银行？
银行是一个能够使存款人和借款人相匹配，并有助于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机构
珍妮·戈巴

53 书评

《危机之后：主要的经济学家重新评估经济政策》
奥利维尔·J. 布兰查德、戴维·罗默、A. 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编)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金融与美好社会》
罗伯特·J. 席勒

图片：第26、30、34、46页，Seemeen Hashem/IMF。

摄影：封面，Justin Lane/EPA/Newscom；第2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6页，Monique Jaques/Corbis；第10页，Suzanne Walstrom/Getty；第13页，Stephanie Rabemifara/Art in All of Us/Corbis；第15页，Andrew Lichtenstein/Corbis；第18页，Francis R. Malasig/EPA/Newscom；第20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40页，Andrew Aitchison/Corbis；第44页，Oscar Medrano Pérez；第45页，Amanda Koster/Corbis；第50页，Destinations/Corbis；第52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53页，Stephen Jaffe/IMF；第54—56页，Michael Spilotro/IMF。

“Empowering Women Is Smart Economics” © 世界银行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美籍全球主义者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C. 弗雷德·伯格斯滕的采访

大导演伍迪·艾伦、爵士大师迈尔斯·戴维斯、厨神茱莉亚·查尔德和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之间有何共同点？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再想一想？时间到！答案是他们都是因对全社会和全球作出杰出贡献而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的美国公民。当然，法国人喜欢伍迪，喜欢爵士乐，当然也喜欢美食。但是，伯格斯滕作了什么贡献？甚至你可能要问，伯格斯滕是谁？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其他得主们往往周游世界，而伯格斯滕一生中的工作主要是在环绕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高速公路——“首都环线”（Beltway）内开展的。1981年，伯格斯滕在此创办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并一直担任该研究所的负责人。此前他曾在美国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最初是在尼克松政府下由亨利·基辛格率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职。基辛格

称，伯格斯滕向他传授了“有关经济学的所有知识”。此后，在能源危机的动荡时期，伯格斯滕成为美国财政部顶级国际经济学家，为卡特总统充当幕僚。最近，他公开宣布将在2012年底不再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职务。

伯格斯滕一生致力于将全球化思维注入眼界狭隘的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并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些成就为他在海外赢得了诸多荣誉，如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等。他曾是欧元的坚定支持者，还强烈批评说人民币被低估，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币低估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并破坏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1991—2001年期间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并在此后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迈克尔·穆沙将伯格斯滕比作“开放经济的传播者”。

出生于福音传道士之家

从伯格斯滕出生在一个传道士之家来看，人们很难预料到他后来会从事开放经济学。伯格斯滕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阿米蒂维尔（Amityville，很多美国人通过风靡一时的《阿米蒂维尔鬼屋》（Amityville Horror）一书和电影了解到了这一地区），此后迁至密苏里州法明顿市（Farmington），伯格斯滕说，这个地方“就像其地名（farm是农场的意思）一样，位于一个基本上是农村的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与学习相比，篮球运动占据了年轻的伯格斯滕的头脑。迄今为止，伯格斯滕仍然积极参加这项运动。

伯格斯滕的个人经历几乎全部都发生在美国，这如何造就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喜爱？伯格斯滕将之归结于小时候的一次英国之旅。1951年夏天，当时年仅10岁的伯格斯滕与父母一同来到了英国。他的父亲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参与了教会的全球牧师交换项目，此次是作为交换牧师到英国传道。“那时的伦敦由于遭到轰炸，很多人无家可归，”伯格斯滕说。对于他们这样的外籍家庭，是无法获得食物配给的。“这样，我就到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也体会到了战争带来的后果……我认为，正是这段经历使我真正走上了那条道路。”

伯格斯滕在父母曾经就读的位于美国密苏里州费耶特的中央卫理公会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对“政治学、历史学和辩论以及一切和政治相关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年夏天，他跟随大学组织的参观团来到了奥地利和德国。在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轮船上，他注意到每天都会有人在甲板上举办有关国际事务的研讨会。伯格斯滕说，他“可以说是悄悄地靠近了过去”。

研讨会的组织者正是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J. 威廉·富布莱特的参谋长赛斯·提尔曼。提尔曼鼓励伯格斯滕到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研究生，培养对国际事务的兴趣。提尔曼本人“也是弗莱彻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帮助下，我被该学院录取，从此真正步入了该领域”。

与基辛格的“冷战”

1968年，27岁的伯格斯滕从弗莱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被基辛格招致麾下，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事务助手。这个职位在伯格斯滕看来，如同“教皇的军事顾问”。“冷战”不断升级，基辛格完全专注于宏观对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但对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则鲜有兴趣。伯格斯滕说，基辛格告诉他：“弗雷德，我要你以我的名义完成所有的事情，不要来烦我。”

伯格斯滕说，这种安排方式最初很有效，但是“后来，有很多事情我必须要有他的帮助，而他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完成我的工作”。于是，在1971年年中，伯格斯滕向基辛格请辞，他对基辛格说：“你似乎不需要，或者配不上我提供给你的优质咨询服务。”1973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稿，指出“亨利·基辛格在经济问题上的业绩令人失望”，“超级明星单打独斗，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

伯格斯滕说，他“那时候明显（对基辛格）有些生气”。后来，他和基辛格终于言归于好。伯格斯滕说，他从基辛格那里收到一张带有基辛格签名的照片，上面写着“致弗雷德：我所有有关经济学的知识都拜你所赐”。在一次活动中，基辛格在介绍伯格斯滕时风趣地说：“（在离开我后，）弗雷德在卡特政府中取得了极其杰出的成就，这一成就（在我那里）是很难取得的。”

应对各种紧要问题

1976年11月，卡特在当选美国总统后，马上召集伯格斯滕到佐治亚州向他汇报所有的国际经济问题。伯格斯滕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所有国际经济问题，并

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有关国际经济问题的最高负责人。

在新当选的卡特总统看来，解决由于世界原油价格飙升导致的危机问题是当务之急。1977年4月，在担任美国总统一职四个月后，卡特穿着一件毛衣，坐在炉火旁，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讲话，展示美国人应该如何降低对国外进口原油的依赖性。他在讲话中宣称，战胜能源危机“从道义上讲，相当于战胜战争”。

迈克尔·穆沙将伯格斯滕比作“开放经济的传播者”。

这对伯格斯滕来说也不啻于一场“战争”，不过他早已作好了准备。早在1962年夏天，伯格斯滕就曾在埃索国际石油公司（此后成为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过。如同其他石油公司一样，埃索公司过去通常在一个地方生产原油，然后将之运至通常很远的其他地方的炼油厂进行加工。伯格斯滕认为，显而易见，如果某家公司可以安排与另外一家公司交换原油的交付，每家公司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将原油运往更远地区炼油厂的运输成本，从而节省大量费用。

找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的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21岁的伯格斯滕身上。“于是，我就想，如果我们埃索公司从壳牌石油公司获得其来自委内瑞拉的部分原油，将之运输至我们位于距离委内瑞拉很近的库拉索炼油厂，另一方面将我们在中东地区生产的部分原油给壳牌公司，并送至其位于非洲的炼油厂，我们两家公司都可以节省下大量的费用，两家公司都能从中受益。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967年，当为期六天的中东战争爆发后，伯格斯滕的经验正好派上用场。伯格斯滕说，当时美国国务院“非常担心石油的获取情况，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们根本不知道石油何去何从”。伯格斯滕说，他能查明这一情况。通过他此前与埃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的关系，伯格斯滕帮助美国国务院收集到了相关数据，“该数据也成为了此后建立的防卫机制的一部分”。

伯格斯滕对能源问题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并“或多或少预测到了‘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1970—1971年期间，伊朗国王和刚刚接管利比亚的卡扎菲“不断推高石油价格，都想打败对方，结果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伯格斯滕说，他“能够看到未来的走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两个，多个欧佩克”（One, Two, Many OPECs）的著名文章。在文中，他预测欧佩克将取得成功，并警告其他一次性资源产品也将形成卡特尔联盟。

一方面，欧佩克如伯格斯滕所预料的取得了成功，但伯格斯滕针对其他卡特尔联盟正在形成的警告在很

大程度上并未最终兑现。公平地说，这在部分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警告以及欧佩克的成功引起了资源进口国决策者的警觉，使其采取行动极力防止其他卡特尔联盟的形成。穆沙在《弗雷德·伯格斯滕与世界经济》中写道，伯格斯滕是一位“乐观的灾难预言家”，一方面，他有“预测经济灾难的癖好”，另一方面，他“总是对未来保持基本乐观的观点”，认为通过建设性的政策举措可以避免那些最坏的结果。

伯格斯滕在能源问题上的丰富经验及其认为政策举措可以发挥影响的观点，对于卡特总统来说尤其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此后伯格斯滕也因此荣获美国财政部“杰出服务奖”。不过，伯格斯滕说，即便没有能源危机，这也会是“各种国际经济问题爆发的热点时期”。（有关伯格斯滕在美国财政部所取得成就的更多信息，见专栏1。）

智库生涯

伯格斯滕对美国政府所作的贡献已足以确保他获得某些长期的声誉，不过伯格斯滕在这以后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地位。1981年，在美国公共政策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下，他组建了一家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在智库领域，伯格斯滕并不陌生：他曾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政府服务部门以及布鲁克林研究所工作过多年。

此后，国际经济研究所更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其部分原因是为了感谢创办该研究所的董事长彼得·G. 彼得森提供的资助。英国记者马丁·沃克将该研究所称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该研究所一经创办即取得成功，此后成就源源不断。1987年通过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采纳了关于汇率目标区的概念，该概念便来自于由伯格斯滕以及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建议。当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理查德·达尔曼指出，协议中使用了“参考汇率”一词，使汇率目标区建议中的债务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降低。

多年来，在量化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代价以及提倡为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不利影响的各方提供援助方面，彼得森研究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99年，彼得森研究所的加里·哈夫保尔指出，美国参议院计划通过的钢铁进口限额法案所保留的就业岗位不到3000个，而每个岗位给纳税人带来的成本却达到80万美元。伯格斯滕说：“那天，每个参议员手上都拿着（我们的）那份分析报告……当天出版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议题。最终该法案遭到了否决。这是智库的成果应用于某个具体政策问题的典型案例。我们在早期就开展了基本的分析工作，并不断完善，将分析结果应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并且将分析报告送至决策者的手中。”三年之

后，该研究所有关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成本估算，对于确保一项恢复美国总统贸易“快速审批权”的法律得到通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说，很少有政府部门以外的哪个机构能像彼得森研究所一样对美国政府的全球经济观点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美国人和世界公民，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拥有彼得森研究所，萨默斯如此写道。

欧元的积极支持者

欧元的采用，是世界货币发展史上一件非凡的事件。不过，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对欧元能否取得成功持怀疑态度。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基于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该理论认为，统一货币只有在特定条件普及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这些条件包括工人可以在采纳统一货币的不同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并且建立一个可以将资金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转移至表现相对较差的经济体的体系。那些采用欧元的国家缺乏上述条件，使得很多美国经济学家预测，欧盟这一经济联盟将会最终陷入泥潭。比如，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199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指出“希望管理一个货币联盟以及随后发展一个政治联盟……可能导致欧洲内部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加剧”。

专栏1

保持贸易的再平衡，1977年和2007年

1977年，当卡特的经济团队上任时，采纳能源计划是其“第一要务”，通过降低经常项目余额的规模保持全球需求的再平衡则是其次的任务。事实上，即便能源计划的目标也是通过减少石油进口量来降低美国贸易经常项目的赤字。

当时，英国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状况。在从福特政府向卡特政府过渡期间，英国人游说伯格斯滕，希望减少此前IMF支持的计划中所达成的公共支出削减幅度，削减公共支出被作为降低英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措施之一。凯瑟琳·波尔卡和艾里克·凯恩克罗斯在其《再见，大不列颠：1976年IMF危机》一书中写道：“在两个多小时内，（英国代表）哈罗德·莱沃极力想说服伯格斯滕，卡特政府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福特政府时期的财政压力。伯格斯滕的答复是‘不’。”

同时，伯格斯滕还反复劝说日本和德国两个拥有大量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希望两国刺激其国内经济的发展，以防其货币的被迫升值。30年后，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再次成为政府的首要议程。2007年，IMF牵头负责通过“多边协商”机制让多个经济体，包括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就减小其经常项目余额的政策举措达成协议。

不过，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对此持相反意见。其中一位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看似不可思议的是，蒙代尔也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创立者。他认为，货币联盟将导致经济联盟的形成；也就是说，采用欧元将创造那些有助于最优货币区域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条件。另一位欧元的积极支持者就是伯格斯滕。不过他说，他的立场来自于“政治经济视角”，而非最优货币区域视角。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期间，伯格斯滕与欧洲决策者积极沟通，他坚信，欧洲决策者最终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不断推动一体化进程”。

“除非美中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所有经济问题很难取得重大进展。”

欧洲最近的危机并未改变伯格斯滕的看法。欧洲决策者“在危机的每个阶段都已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避免出现崩溃”。伯格斯滕说，“德国将付出其必须付出的代价”来拯救欧元，这是因为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欧元也促进了德国贸易的发展。他预言，欧洲正缓步走向“全面的经济联盟。五年之后……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

20国集团和两国集团

除欧元区以外，伯格斯滕发现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诸如20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集团（20国集团）这样的论坛是“绝对必要的，有众多合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新兴市场目前占据全球经济的一半，“它们是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你不可能仅仅由七国或八国集团（仅代表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来管理整个世界”。2008—2009年期间的“大衰退”进一步加快了“20国集团”地位合理化的进程。“不能再犹豫不定了，”伯格斯滕说，“必须将所有适宜的人集中在一起控制危机。”

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伯格斯滕同样提倡建立“两国集团”，即由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一个隐性集团。伯格斯滕说，他的建议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论点，即除非美中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所有经济问题很难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就是由于美中两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从而阻碍了其他更多国家的谈判进展。他还指出两国在汇率问题上僵持不下的局面：“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而中国则一直设置障碍”（见专栏2）。

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兰德尔·亨宁说，伯格斯滕

专栏2

中国及“自行车理论”

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以其独立见解而闻名。不过，他们对有关中国汇率的观点则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比应该达到的水平低20%—30%，这意味着对中国出口商品提供补贴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伯格斯滕在去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稿中写道。他说，美国应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诉讼，控告中国“参与非法竞争性货币贬值活动，如果中国不停止此类贸易保护性政策，美国将采取报复性措施”。

伯格斯滕的强硬观点部分反映了他著名的“自行车理论”——他认为，如同自行车一样，贸易自由化必须保持部分向前的动力，否则就会开始回转至贸易保护主义。伯格斯滕写道，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种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威胁：“美国或其他国家针对中国行动的对策（应）被视为反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

提倡建立多个国际论坛的前提条件是“各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公共利益——中的合作长期不足。主要的问题不是过多论坛的建立会引起机制上的‘意大利面碗效应’，而是不能充分利用这些论坛的问题”。

“一系列五十周年庆典”

伯格斯滕现年70岁，他将迎来一生中众多的周年庆典。他热衷于庆祝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使他能够与那些影响他一生的人和组织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去年，他组织了中央卫理公会大学同班的50周年同学会。今年，他将负责组织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研究生班的50周年同学会，以及他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对我来说，这是一系列的50周年庆典，”伯格斯滕说。

至今，伯格斯滕仍然活跃于政界和篮球场。他定期主持在彼得森研究所内、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型会议室中举办的很多“特邀”活动。穆沙曾经开玩笑说，尽管“鉴于弗雷德父母的身份，有些人可能认为（会议室）看上去像一个现代化的教堂，但我认为它像一座篮球场。弗雷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篮球迷”。事实上，伯格斯滕至今仍在一个篮球俱乐部打球，每场比赛平均得分达到38分，这一成绩在同样也是篮球爱好者、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伯格斯滕承认，这个分数是有些高，其原因在于“这个俱乐部是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俱乐部，不过你仍然必须将球投入篮网中”。■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顾问。

前途未卜的年轻

大卫·E. 布鲁姆

从欧洲和日本的大量失业青年到开罗和拉各斯街头的抗议青年，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已感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并要求实施变革。

无论是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阿拉伯世界的群众集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积极行动起来，针对减少的就业机会和无法实现的抱负作出响应。



在开罗解放广场参加抗议的女性。



感到受挫和愤怒 的全球青年要求 实施变革

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已意识到全球危机的持续正在粉碎很多人的希望、制造紧张局势和激发反对之声。在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在鼓动变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们所呼吁的改革并非只是针对年轻一代，而是针对整个社会。

适应力强、善于沟通

全球经济危机因为欧元区的问题而持续，已使成百上千万青年失业——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率达到了 50%；在葡萄牙和意大利，这一比率为 30%。全球经济危机将可能产生大量的“失落的一代”，且可能难以恢复，还可能造成长期严重的人员损耗。

年轻人的自然适应力强，需要抚养的人通常比年轻一代更少。不过，长期失业的年轻人的自信心和技能往往会逐渐减弱，并且失去与劳动力人口的相互联系（见“失业的悲剧”，《金融与发展》2010 年 12 月号）。这些年轻人可能因此感到灰心失望，失去能力并与现有体制脱节（见“青年之声”，本期《金融与发展》）。

不过显而易见，从长期来看，如今的年轻人将承担创建经济成就和人类安全的任务。

要让年轻人发挥带头作用，这显然意味着必须确保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状态。在部分国家，年轻人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使得人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年轻人身上变得更加容易。而在其他国家，如果年轻人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不断增长，情况将完全相反。在很多国家，资源竞争局面即将出现，这是因为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在做了数十年的贡献后，发现自身处境险境，因而要求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见“老龄化的代价”，《金融与发展》2011 年 6 月号）。

在对其未来经济状况感到担忧和把握不定的情况下，年轻人（相比其他群体）更多地转向从新媒体获取信息，并且与其同龄人和其他人群进行沟通。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年轻人意识到了其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使他们更加意识到了腐败和不公平的严重程度及其对他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在经济衰退和就业机会缺乏的背景下，年轻人在

上述方面意识的增强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不稳定性。因此，年轻人（和其他人群）可能有更充分的理由，在今后的抗议中提出更多的要求。此外，在某个地方引起摩擦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引发世界各地的动荡，比如突尼斯就是如此。

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大？

目前，全球 15—24 岁的年轻人数量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1/6 以上。然而，全球 12 亿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也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中最受政策分析师、商业思想家和学术研究者所忽视的一类人。相反，目前全球 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共计 8.1 亿，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构成了威胁，因而这些老龄人口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儿童和壮年人群。

年轻人（和其他人群）可能有更充分的理由，在今后的抗议中提出更多的要求。

这种被忽视的程度令人吃惊。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是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动者。他们在工作、储蓄、支出、城乡和国际迁移以及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技能、习惯、行为和抱负将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构成深刻影响。自 1950 年以来，全球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持续增长，并且在未来至少 20 年间仍将如此（见图 1）。

当代和未来的年轻人在各国既构成了危险，也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他们是否会如同成年人一样有创造力地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求学期间以及在工作初期的体验和感受。

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首先反映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发展轨迹，其次反映了国际人口迁移的状况。它们还与“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密切相关。“人口转变”是人口学家用来表示人口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长期变化（生育率即每位育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少女们。

量；见专栏）。由于人口生育率在初期的下降速度低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人口转变会首先导致儿童数量的增长，随后将导致 15—24 岁年轻人数量的激增及其占总人口比重的急剧上升。

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上述数据背后导致年轻人心理受挫的部分关键要素。

在构建一个适宜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关注年轻人的抱负）方面，年轻人具有重要作用。

与年轻人有关的经济问题包括就业、收入、储蓄、支出、普及型高等教育以及税收，这些问题对年龄更大的人群可能更加有利。与年轻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则包括同居、婚姻、离婚、生育、性别平等、犯罪和际关系等。与年轻人相关的政治问题包括对正式和非正式政治制度以及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和参与等。

未来人口的健康状况也濒临危险。如今的年轻人

（即未来的就业人群）的健康状况和创造能力未必会超过其父母。（由于城市化进程和转向更多久坐不动型职业导致的）体力活动的减少、肥胖症以及烟酒消费的不断增长，预示着年轻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和就业中的不稳定性将对全球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这表示某个经济体未来的人均生产能力增强，也预示着“人口红利”的前景。“人口红利”是有利于收入快速增长和减贫的、时间有限的机会之窗（Bloom, 2011 年）。只要工作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高，这种机会之窗就会存在，但是如果那些经济体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机会之窗也可能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因此，近期的抗议活动中很多参与者是年轻人，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状况在青年失业率通常很高的社会中以及那些全球经济危机对年轻劳动者影响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均存在。在构建一个适宜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关注年轻人的抱负、满足他们对体面生活水平的需求，并为其带来对未来的期望）方面，年轻人具有重大的作用。

预测说明

所有人口数据和预测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等生育率估算数据。这些预测数据主要依赖于对未来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状况的假定和预测情况。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生育率稳步下降，将从目前的每名妇女生育 2.5 个孩子降至 2050 年的 2.2 个。该变化是 139 个经济体生育率下降以及 58 个经济体生育率增长的净变化值。

对未来平均寿命的估算，则是基于不同国家和男女平均寿命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预测模型得出的。该模型预测，目前人均寿命相对较低的国家在今后其人均寿命将更为快速地增长。

有关人口迁移的假设条件是基于此前的估算值以及各国采取的相关政策。对人口净迁移的预测水平认为在 2100 年前人口迁移率将缓慢降低。

联合国人口司在《世界人口展望：2010 修订版特别分类》DVD 中提供了按收入分类的国家人口数据。收入分类是基于世界银行《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有关分类标准。这些标准以 2009 年人均国民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净海外收入）为准，分别划分为：

- 低收入国家：1005 美元及以下；
- 下中等收入国家：1006—3975 美元；
- 中上等收入国家：3976—12275 美元；
- 高收入国家：12276 美元及以上。

此类体系的缺失，正是产生冲突的重大原因，特别是如今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低廉沟通方式的出现，上述状况更是如此。

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

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特别容易受到宏观经济衰退的影响，并首当其冲地受到 2008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就业复苏缓慢的影响。2007—2011 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从 11.6% 增至 12.7%，而同一时期的青年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力参与率是指正在工作或者正在求职的人口在该年龄组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适度下跌，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心理受挫的劳动者放弃求职（ILO，2012 年）。

在此方面，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大（见“受伤的一代”，本期《金融与发展》）：发达经济体的青年失业率增幅大于 2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失业率增幅（特别是男性）。青年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复苏越缓慢，年轻人与劳动力市场建立紧密联系的可能性就越低。

另一方面，由于年轻人的精力旺盛，同时由于他们愿意从劳动力过剩地区迁至劳动力短缺地区，或者愿意从生产力低的农业转移至生产力相对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年轻人将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复苏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为年轻人提供最新的培训和教育通常也是一项有利因素，尽管教育系统经常传授那些过时或者根本不需要的技能（见“提高教育水平”，本期《金融与发展》）。在此范围内，如果教育通常能够产生的预期值无法得到实现，年轻人也可能推动重大变革，改变现有的体制和领导阶层。

各国范例

以下部分例子将有助于阐述目前所发生的一切。

在关注和尽力实现其不断增长的大量年轻人口的福利方面，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其 15—24 岁人口的数量位居全球首位，并且还在不断增长（印度 15—24 岁人口达到 2.38 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第四大国印尼的总人口数量）。由山姆·皮特罗达担任主席的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指出：“只有投资于年轻人的能力建设，我们的年轻人才会成为我们的宝贵资产。知识型的年轻一代将成为宝贵的资产。如果不进行此类投资，他们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累赘。”印度的年轻人对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萨尔及其倡导的反腐败运动表示强烈的支持，这也证明了年轻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面临同样的状况，且问题更为严峻。巴基斯坦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为 3800 万人，是世界上 15—24 岁人口数量第五大国。不过，由于政府管理组织机构的实施不力、在过去发展状况不佳、经常发生极端社会冲突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不稳定，使得年轻人对巴基斯坦的未来发展缺乏信心（英国文化委员会，2009 年）。这种状况可能成为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恶性循环的导火索。但是，如果巴基斯坦对年轻人的才能和生产能力进行投资并挖掘其潜能，就能使巴基斯坦迈入一个良好的发展轨道，使该国弥补在过去几十年间造成的部分损失，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期望。

在关注和尽力实现其不断增长的大量年轻人口的福利方面，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导致了始于 2010 年 12 月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并导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政府的垮台以及这些地区其他国家的持续冲突。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众多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但是大量的失业者、半失业者和未婚青年往往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有人认为，那些失业人员和未婚青年是相对的无产者，也是变革相对更大的受益者。此外，新的社交媒体（如脸谱网和推特等）在年轻人当中拥有最大的使用份额，这也促进了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和组织。尽管该理论听上去很有意思，但有关年轻人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性质和强度方面的预测力（及其实际影响）的实证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Hvistendhal，2011 年）。

在非洲，人们对年轻人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非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的年轻人身上。1980 年，尼日利亚的人均 GDP 曾略高于印尼，但如今却仅有印尼的一半。人口因素是导致两国宏观经济表现出现巨大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Okonjo-Iweala 等人，2010 年）。印尼的人口转变速度大大超过尼日利亚，这导致尼日利亚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比重相对更大。印尼将其大量的原油收入用于改善年轻人的教育状况，成功地将年轻人纳入生产性就业之中，并提高了其生活水平。尼日利亚可以通过认真研究印尼的情况，从中受益。

当前，尼日利亚 15—24 岁的年轻人数量为 3200 万人，是 15 岁以下人口数量的一倍以上。这些年龄组的人群是该国宝贵的资源。在年轻人的技能和健康方面以及有形资本、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进行投资，将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促进尼日利亚的发展取得成功。为女孩和妇女进行投资，包括投资于生殖健康，

将带来额外的效益，这些效益包括降低生育率和释放社会投资资源。如果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生产性参与的期望，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治的合法性，导致年轻人心理受挫，引发冲突，并妨碍投资。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也必须纠正不同地域、宗教和种族团体之间的不公平现象，采取有利的政策，避免这些不公平现象成为导致冲突和不稳定性的更重要的原因。

正在发生的变化

不过，预计年轻人的影响力将发生变化，这将对其未来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在人口转变相对缓慢的国家和地区，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更高。例如，在高收入国家和欧洲地区，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12%；但在低收入国家和非洲地区，这一比重达到 20% 左右。年轻人的数量自 1970 年以来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 1.4%，但在未来几十年间将处于基本停滞状态，2012—2050 年这一比例将降至 0.1% 以下。

2012—2050 年，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逐步降低（而这一比例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稳定），与 0.73% 的总人口增长比率相比，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增长比率将相形见绌。

不过，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掩盖了各国和各地区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性。比如，斯威士兰的 15—24 岁年轻人比重最高，占总人口的 24.5%，接近日本（9.7%）、西班牙和意大利（9.8%）以及希腊（10.1%）的 2.5 倍。

在高收入国家，15—24 岁年轻人的数量已经停止增长或者不断下降。相反，在低收入国家（2.6%）、下中等收入国家（2.1%）和非洲地区（2.7%），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却一直以极高的速度增长。不过，这种状况在低收入国家将很快结束。

今后，绝大多数收入类别的国家和地区的 15—24 岁人口的增长率都将降低。该增长率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亚洲、拉美和欧洲地区将转向负增长（或者负增长的比例扩大）（见图 1 和图 2）。1950—2010 年，15—24 岁年轻人数量稳步增长的状况将逐步减弱，并在 2035 年左右达到 12.6 亿人的停滞状态。仅在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将继续增长。

随着上述转变，今后世界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集中度将大幅转向非洲地区。目前，非洲地区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占全球的 17.5%，而亚洲的这一比例高达 61.9%。预计到 2050 年前，非洲地区的这一比例将增至 31.3%，而亚洲地区将降至 50.4%。

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

不过，预计不久之后，全球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数量就将被老年人的数量所超过（见图 3）。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数据显示，15—24 岁人口数量增幅的放缓以及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增幅的加快，将导致在 2026 年人口结构出现反转，届时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年轻人口数量。事实上，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已经出现在高收入国家（1990 年）、欧洲地区（1982 年）、北美洲地区（1987 年）和大洋洲地区（2011 年）。预计在下个 10 年的初期，上中等收入国家也将出现类似情况，亚洲地区随后不久也将如此。

如上所述，印度 15—24 岁的年轻人数量共有 2.38 亿人，位居世界首位，预计未来几十年间其年轻人的比重还将进一步增加。而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15—24 岁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将从现有的 2.17 亿降至 2030 年的 1.58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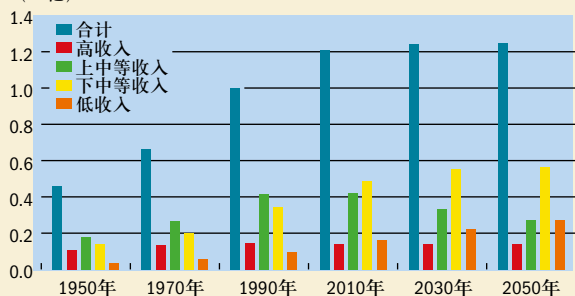
当今大量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并不意味着这部分

图1

更多的贫困青年

随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年轻人口数量将相对更多。

（10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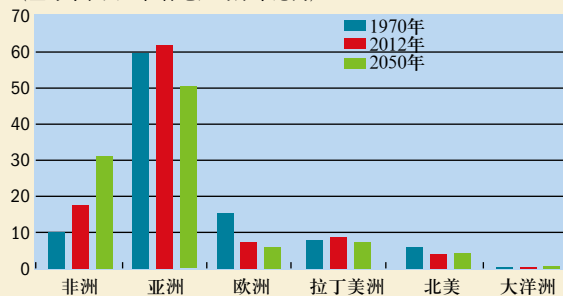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

图2

地域转变

2050年前，非洲地区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将不断加大，但全球年轻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将仍为亚洲地区。

（全球年轻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

人口的数量在今后将进一步增长。在2012年，拥有15—24岁年轻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5个国家的年轻人口数量预计在2030年前将继续增长，另外5个国家则预计将会下降。从全球范围来看，15—24岁年轻人口增幅最快的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即尼日尔、赞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而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将是波黑（-2.4%）、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2.3%）以及古巴（-2.2%）。

如何应对？

我们将何去何从？如上所述，年轻人可以推动变革，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能从中受益。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众多领域进行改善。

首先，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改善培训和教育状况（在所有层次上改善教育的公平获取性和质量）。这并非易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很多国家必须采取新的思维（并可能动用新的资源），以便使年轻人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并且达到使年轻人自身以及整个经济体受益的目标。

义务性或志愿性的服务项目，如国家兵役和美国和平队等志愿组织，可以锻炼年轻人的社交能力，向其灌输社会群体意识，增强其自尊心，同时向其传授符合市场需要的技能。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扩大学徒训练的范围，特别是针对年轻人以及那些未满25岁的人群，这一点目前在英国已经比较普及。同时，更加重视培养年轻人的理财和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创业技能，也将带来良好的回报。

其他优先考虑事项包括提供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制定更加精心调整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更多的金融市场服务、将年轻人面临的各种问题纳入在内的政府治理以及普及医疗保健服务等。最后一点（即

普及医疗保健服务）至关重要。保持健康状态与教育和培训同等重要，使年轻人能够增强必要的技能，从而成为社会中具有经济生产力的成员。如同所有其他年龄组一样，年轻人如要发挥其潜能，也必须获取到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要发挥年轻人的活力，必须应对性别、收入和城乡不平等问题，满足年轻人的期望值。此外，还必须应对家庭成员关系日益松散的问题，比如可以通过将工作机会转移至人员居住地，从而减少年轻家庭成员由于经济问题被迫迁居的状况。

不过，仅仅实施这些措施还不足以确保全球年轻人有一个良好的未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以及有效的机制，使年轻人获得这些就业机会），并确保年轻人完全融入整个社会体系，公平地分享所有资源及其带来的效益。

15—24岁年轻人口增幅最快的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即尼日尔、赞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

在高收入国家以及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政治影响力已开始降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今后数十年间，随着其人口开始老龄化，年轻人的政治影响力也将开始逐步减弱。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身上，今后所有国家的老年人都将得到更好的赡养。

最后，各个组织、决策者和全社会必须认真倾听年轻人的想法。当地社区、各个城市、省份和国家可以建立相应的论坛，以倾听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担忧和看法并促进变革。可以在决策机构中为年轻人提供表达其观点的机会。为使这一过程真正发挥价值，可以邀请那些代表贫困人群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年轻人参加论坛，从而使得年轻人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体现。包容可以使所有人从中受益。■

大卫·E·布鲁姆（David E. Bloom）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经济学和人口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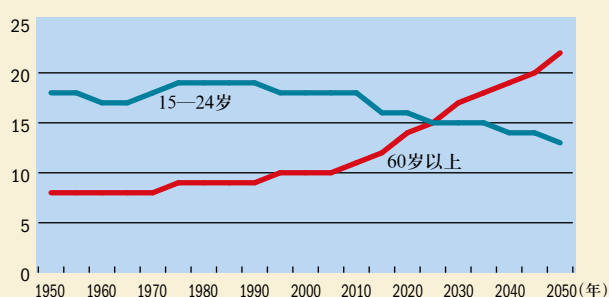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Bloom, David E., 2011, "7 Billion and Counting," *Science*, Vol. 33, No. 6042, pp. 562-69.
- British Council, 2009, *Pakistan: The Next Generation* (Islamabad).
- Hvistendhal, Mara, 2011, "Young and Restless Can Be a Volatile Mix," *Science*, Vol. 33, No. 6042, pp. 552-54.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2,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2: Preventing a Deeper Jobs Crisis* (Geneva).
- Okonjo-Iweala, Ngozi, David E. Bloom, and others, 2010, *Nigeria: The Next Generation Report* (British Council and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图3

青年与老年

年轻人口数量超过老年人口数量的时间仅能再持续十多年。
(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

提高教育水平

伊曼纽尔·希梅内斯、伊丽莎白·M. 金、谭吉平

改变年轻人的
学习内容
和学习方式，
是帮助他们
及其所在国
家取得成功
的最佳途径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时间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然而他们所学到的技能却并非那些为找到良好的就业机会所必须的技能。因此，他们职业生生产力低于应有的水平，并对其所在国家的发展潜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教育量化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例如，仅在过去 20 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小学教育净入学率就从此前的大约 50% 增至 80%。

不过，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教育质量的改善方面相对并不成功。教育质量是通过评估学生的学业表现来进行衡量的。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并未掌握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适宜技能，这往往使他们在面临更多创收机会时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最后，无论是由于教育制度本身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由于国内冲突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很多年轻人可能提前退学或者失业。这就要求建立所谓的“二次机会”教育项目，使这些年轻人能够重返学校或者获得新的工作技能。

那么，发展中国家能否改善其教育体系的质量，更好地传授相关技能，使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并且在他们毕业后能够找到工作，或者在他们退学或者找不到工作时为他们提供二次学习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一个系统性的途径来改变学生们学习的内容及其学习方式，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教育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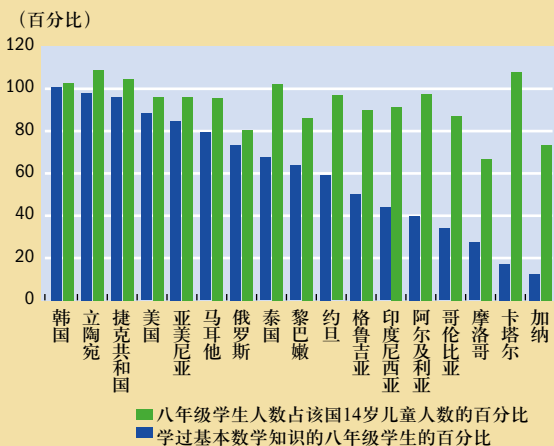
基本能力低下

鉴于很多年轻人在退学时的受教育程度很差，参加工作时并不具备为适应经济发展及其生活中的变化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或行为。国别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极其低下。在马里，接受测试的学生根本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甚至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50%—60% 的学生看不懂其本国语言常用词汇表中的任何一个词（Ralaingita 和 Wetterberg, 2011 年）。对巴基斯坦的三年级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仅有一半的学生能够回答一些最基本的乘法题（有关引述和其他范例，参见世界银行, 2011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如“国际数学和科学发展趋势研究”证实了这些国家较低的教育水平。即便在那些实现了基础教育较高入学率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如柬埔寨、印尼和泰国等，14 岁孩子的八年级入学率与那些学过基本数学知识的八年级学生的比例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见图）。

此外，各国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显著不平等，这表明不仅必须在所有层次上开展相关的优质教育，还必须为那些难以接受教育的群体或者贫困群体提供基础教育机会。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取决于教育政策的设计和有效性，而非收入水平（Hanushek 和 Woessmann, 2008 年）。

教育差距

在很多国家，孩子们入学某个年级并不意味着能接受该年级学科的教育。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数据库。



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印尼雅加达。

不相关的课程设计

即便那些获得足够基础教育的年轻人，由于不具备当今社会的雇主（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雇主）所需要的技能，可能也无法找到工作。尽管有年轻人不断失业，但接受调查的雇主仍抱怨说找不到具备为发展其业务所必需技能的足够数量的员工。

其中一个问题是年轻人缺乏为企业立即创造效益所必需的技能。比如在印度，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这使得部分行业（如软件、银行、制药和零售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开发设计自身的培训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建立自己的企业大学来培养企业未来所需要的人员（Wadhwa、De Vitton 和 Gereffi，2008 年）。如果雇主认为可以对年轻人提供就业培训，那么年轻人缺乏必要的技能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不过，如果年轻人的基本能力较差，他们就不可能受益于在职培训——在职培训往往是雇主为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所提供的。因此，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入学率偏低，不利于年轻人的就业。

对非认知性技能或者“软技能”的重视程度似乎也不够。根据对多个地区的雇主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在很多方面仍存在不足，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团队合作、沟通能力、承担责任的意愿、批判性思维、主动性、创业精神和准时性等（IFC 和 IsDB，2011 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转向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地域分散的业务融合为全球生产性网络，以及必须跟上技术进步和针对新的市场动向作出响应，上述技能在现代办公场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同样的调查结果表明，雇主日益将外语能力（特别是英语能力）和基本的计算机使用技能视为基本技能。

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决定

与成年人相比，年轻人在制定针对未来的长期决定时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对现在的教育学习进行多大程度的投入。首先，年轻人在做决定时缺乏经验，可能缺乏作出明智决定所必要的信息。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2001 年接受调查的男童在小学最后一学期都能准确地达到完成小学学业的水平，但其中的 1/3 被严重低估了达到中学学业的水平。这是因为他们的

判断仅仅基于那些完成中学学业后仍留在村里的年轻人的工资水平；而事实上那些高薪的年轻人已迁出村外（Jensen，2010 年）。

年轻人在教育方面无法作出良好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乏资金。在经过初期的中学教育后，年轻人开始更多地利用自己的资金来资助自己接受教育和培训。即便这些投资得到大量补贴，投入时间进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绝大部分由年轻人自行承担。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广泛提供助学金和贷款来为年轻人接受教育提供经费。

最后，最近的研究表明，大脑发育主要是在青春期之后，特别是承担执行功能的额叶部分。这些功能使年轻人能够通过比较接受教育的现有及预期成本和效益，在教育方面作出明智的决定。如果学生们要获取成功只有一种途径，他们就不太可能由于年轻而只顾眼前或采取冒险的行为。

缺乏二次教育的机会

即便有获得优质教育的足够机会，年轻人及其父母或者政府仍有可能在教育方面作出糟糕的决定。

2009 年，全球 6700 万小学适龄儿童以及 7200 万初中适龄儿童无法上学。这些儿童绝大部分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和西亚地区，上述地区占全球未能入学的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46% 和 57%。这些儿童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将永远没有机会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获得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二次教育机会计划是改善他们命运的救命稻草。此类教育计划包括识字课程、同等学历教育以及针对就业技能的职业培训课程。有关这些年轻人获得二次教育的信息并不完整，不过根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 年，在该地区的 39 个国家提供了 154 个此类教育计划，350 万儿童从中受益；2009 年，非洲辍学的年轻人数量累计达到 5200 万（DeStefano 等人，2006 年）。

由于按照定义所针对的受益者是贫困群体，因而二次教育计划往往缺乏能够提供持续资金承诺的政治支持。同时，这些教育计划往往成本高昂，缺乏被重新纳入主流教育体制的可靠途径（如通过同等学历教育认证），也缺乏与就业之间的联系，而这一点对于年

龄较大的青少年而言特别重要。

未来对策

在如何改善接受教育的程度方面，目前已有很多方法，并且也采取了部分措施。不少国家开始将大量的公共支出投入到教育和培训。不过，各国必须更多地扩大针对年轻人的教育机会，特别是提高教育的质量。各国还必须帮助年轻人及其父母在这些教育机会中作出明智的选择，但由于选择不当的情况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各国必须建立具有成本效益比的二次机会教育计划。

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计划是那些关注于可衡量成果的系统性教育计划（世界银行，2011年）。

如果学生们要获取成功只有一种途径，他们就不太可能由于年轻而只顾眼前或采取冒险的行为。

首先，必须认识到，针对年轻人的教育制度改革并不仅仅是改善小学之后的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同时也应扩大非正式私立教育机构，并推动在家学习和社区的继续教育。这种系统途径可以防止教育改革的破碎化——支离破碎的教育改革可能导致基础教育体系中的毕业生数量增多与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中的受教育机会有限之间的不平衡，以及造成学校所传授的技能与私营部门雇主所要求的技能之间的差距。这种系统途径还意味着，儿童必须以营养状况良好和健康的身体进入青少年时期，以便能在其发育成长时期进行学习。这就要求提供良好的学前和小学教育，同时要求父母为孩子学习提供更大的支持。

其次，必须认识到，改善学习效果不仅仅是在学校和教室建设以及经过正规训练的教师、教授和教材方面开展投资：只有通过对教育体系的良好管理并且注重效果，这些投入才能有助于改善教学质量。要提高教育质量，首先必须对学习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测，然后利用这一结果来指导对学校管理和资助的方式，以及招聘和提拔教师的方式。学校教师和校长必须获得相应的工具和充足的资源，并且必须对明确制定的成果负责。由于学校治理和责任制的失效往往对那些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学校影响最大，因此系统途径有助于推动教育的公平性和效率。

第三，必须建立相应的教育计划，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二次机会，帮助他们在投资人力资本时作出明智的决定，以便在他们自身或他人作出错误决定时能够得到改正。在以上提到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中，提供更多有关教育回报的信息将达到

很好的效果。那些获得高中毕业生实际收入数据的八年级学生，与那些未获得该项数据和信息从而低估了继续接受教育所带来回报的同龄人相比，更有可能接受中学阶段的教育（Jensen，2010年）。

第四，必须评估创新教育计划的影响。二次教育计划包括为那些长期辍学和长期失业的年轻人提供众多的干预措施。这些教育计划未得到普及，其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其成本超过正规教育的成本。不过，根据最近对拉美 Jóvenes 教育计划以及其他类似举措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得到适宜的设计和强有力的实施，这些干预措施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比的方式让年轻人重返主流劳动力市场（世界银行，2006年；Attanasio、Kugler 和 Meghir，2011年）。

尽管这些教育计划并非理想的解决之道，但它们将有助于年轻人很好地利用其才能和精力，增强其成功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其所在国经济的发展。■

伊曼纽尔·希梅内斯（Emmanuel Jimenez）现任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公共部门评估的主任；伊丽莎白·M. 金（Elizabeth M. King）是世界银行人力开发网络教育的主任；谭吉平（Jee-Peng Tan，音译）是世界银行人力开发网络教育的顾问。

参考文献：

- Attanasio, Orazio, Adriana Kugler, and Costas Meghir, 2011, "Subsidizing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in Colombi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3, No. 3, pp. 188–220.
- DeStefano, Joseph, Audrey-Marie Schuh Moore, David Balwanz, and Ash Hartwell, 2006, "Meeting EFA: Reaching the Underserv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Models of Effective Schooling," *EQUIP2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USAID/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 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6, No. 3, pp. 607–68.
-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and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IsDB), 2011, *Education for Employment: Realizing Arab Youth Potential* (Washington: World Bank).
- Jensen, Robert, 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5, No. 2, pp. 515–48.
- Ralaingita, Wendi, and Anna Wetterberg, 2011, "Gaug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with EGRA: Impact Evalu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Mali," Chapter 3 in *The Early Grade Reading Assessment: Applic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Basic Literacy*, ed. by Amber Gove and Anna Wetterberg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orth Carolina: RTI International).
- Wadhwa, Vivek, Una Kim de Vitton, and Gary Gereffi, 2008, "How the Disciple Became the Guru," *Global Engineer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report*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 , 2011, *World Bank Group Education Strategy 2020: Learning for All—Investing in Peopl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Available at <http://go.worldbank.org/DTQZ9EKJW0>

受伤的一代

汉南·摩西

纽约市的人才招聘会上，求职者正在排队等候。

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地的年轻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其复苏速度也更为缓慢。

年轻人在找工作时往往遭遇困难。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发达经济体中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年龄更大的各类群体失业率的2—3倍。然而自2008年爆发全球危机以来，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比年龄更大的工作者失业率的增幅明显加大；而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欧洲地区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就业难题。

失业将给年轻人的个人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如果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或者不能长期维持一份工作，可能对年轻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前景带来长期的、危害严重的后果。同时，年轻人失业也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将显著扩大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2007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真正出现之前，年轻工作者事实上已陷入困境。发达经济体中15—24岁的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平均达到13%，而年龄更大的工作者失业率大约为5%。目前，这些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已攀升至接近20%的水平，是年龄更大的工作者失业率（大约7%）的三倍。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速度缓慢，年轻

工作者的失业率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各国的青年失业率存在显著差异。在危机发生前，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但希腊和意大利的这一比例超过了20%，而荷兰和日本不到10%，美国也仅为10%左右。在部分国家，如瑞典和英国，青年失业率达到成人失业率的四倍。

自2008年以来，青年失业率出现了上涨（见图），美国的这一比例达到了18%以上，而意大利和瑞典则上升至25%左右。青年失业率增幅最大的国家是西班牙。2011年，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从2008年的不足20%增至近40%。但在德国，由于学徒教育计划发挥了良好的功效，并且由于引入了短时工作制，为那些在经济放缓时期减少工时而非辞退工作者的企业提供补贴，德国的青年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不过，德国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仍是成人失业率的1.5倍。

然而，总体失业率并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因素。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年轻工作者失业的持续时间，通常是他们在找第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在发达经济体中，20%的失业年轻人求职的时间达到一年或超过一年。在欧元区国家，该比例甚至更高，达到30%。该比例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40%的失业年轻人求职的时间超过一年。通常，失业时间过长的工作者会丧失本身的技能以及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失业所带来的受挫感不

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年轻工作者的失业率大幅增长，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才会降低

断增强，已导致大量心理受挫的失业年轻人放弃求职，因而失业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实际的失业状况。

难以找到工作

通常，与成年工作者相比，年轻人在求职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其原因很多。首先，年轻人相对缺乏工作经验，缺乏对求职方式和求职途径的了解，并且欠缺求职的社会关系。此外，很多年轻人缺乏雇主所需要的技能，这又往往是由于落后的教育制度所导致。因此，很多年轻人从学校到就业的过渡时期总是困难重重，有时甚至经历很长的过渡期，现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则面临更大的困难。即便那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与成年工作者相比也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雇主通常更倾向于首先雇佣那些成年工作者。

此外，导致长期失业问题的还有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做法，特别在欧洲地区更是如此。与成年工作者相比，年轻工作者更有可能从事临时性的工作。在危机前，发达经济体接近 1/3 的年轻工作者签署的是临时性的劳动合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各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临时工作者，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规避那些使企业难以解雇正式工作者的法规。随着经济的萎缩，临时工作者首先遭到解雇；此外，很多临时工作者没有资格获得公司支付的离职金——要解雇这些临时工作者不仅更为容易，成本也更为低廉。西班牙一半的年轻工作者在危机前属于临时性就业，他们也是首先失业的一类人。这些年轻工作者在被解雇时往往面临双重打击——不仅失去了工作，同时也很少能获取到社会福利救济金。

“伤痕效应”

失业除了给年轻人带来短期问题外，还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这些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失业的人在今后再度失业的可能性相对更大。此外，与那些相对更容易地找到工作的同龄人相比，那些失业的年轻人在工作年限期间的收入也可能更少（von Wachter、Song 和 Manchester，2009 年；Kahn，2010 年）。有关专家将早期失业所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称之为“伤痕效应”。技能的退化和工作经验的丧失等因素是导致“伤痕效应”的原因。不过，潜在雇主认为这些长期失业工作者不会为其创造价值，也是导致“伤痕效应”的原因之一。通常，一个人的失业时间越长，“伤痕效应”可能持续的时间就越长。与那些职业生涯早期相对容易地找到工作的同龄人相比，长期失业年轻人的收入可能平均低 20%，而这种收入差距持续的

时间可能长达 20 年。

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刚大学毕业时，经历失业对其终身收入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比如，在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的“失落的十年”期间，那些刚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就体会到了这种“伤痕效应”。长期青年失业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并在经济复苏开始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持续存在，其原因是日本雇主单位更倾向于雇用最近毕业的大学生，而非那些处于长期失业或长期没有经济活动的人员。

研究发现，年轻人长期失业除了对其未来工资和就业能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外，还常常会对今后多年个人的幸福、工作满意度以及健康状况造成不良影响。

代价高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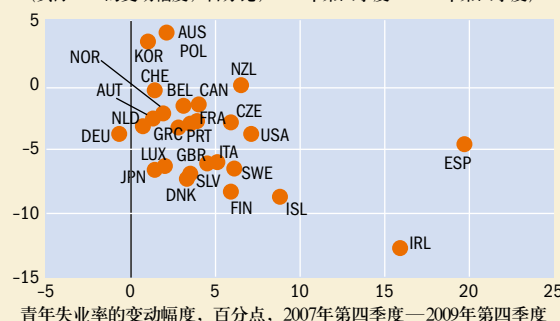
年轻人失业还可能给整个社会造成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未得到充分利用，可能导致代际间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缺乏就业机会可能触发暴力和青少年犯罪的发生。最近保持在高位的青年失业率已导致了包括发达、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社会动荡。

受青年失业率不断增长的影响，很多发达经济体中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根据对 1980—2005 年期间导致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成员的发达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的根本性因素所做的外推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危机将加剧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失业的增加以及新增的就业岗位有限（Morsy，即将发表）。年

令人沮丧

全球危机期间，除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均出现了上升，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上涨了 20 多个百分点，爱尔兰的状况也基本相同。

（实际 GDP 的变动幅度，百分比，2007 年第四季度—2009 年第四季度）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注：AUS=澳大利亚，AUT=奥地利，BEL=比利时，CAN=加拿大，CZE=捷克共和国，DNK=丹麦，FIN=芬兰，FRA=法国，DEU=德国，GRC=希腊，ISL=冰岛，IRL=爱尔兰，ITA=意大利，JPN=日本，KOR=韩国，LUX=卢森堡，NLD=荷兰，NZL=新西兰，NOR=挪威，PRT=葡萄牙，SLV=斯洛文尼亚，ESP=西班牙，SWE=瑞典，CHE=瑞士，GBR=英国，USA=美国。

轻人失业明显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估计危机期间青年失业率的增加已导致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指数（按照基尼系数来进行衡量）提升了4个百分点，导致位于欧洲边缘地区的国家（即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提高了8个百分点——欧洲边缘地区的这些国家的青年劳动力市场恶化的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基尼系数对收入不平等的评分范围从0—100，其中0是指家庭收入完全平等；100是指一个家庭拥有整个社会的收入。

某国的雇主所雇用的临时性工作者数量越多，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越高。

全球危机还产生了更多“怯志”工作者，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怯志”工作者是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各年龄阶层的人士。青年失业率的增长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估计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程度最为严重，收入不平等指数分别上涨了18个和12个百分点。其中建筑行业的失业状况非常严重，而建筑行业是很多低技能年轻工作者的主要就业渠道。导致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失业因素中，接近一半的失业为长期失业。相反，德国和荷兰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几乎没有变动。在这两个国家中，解雇工作者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为兼职工作提供的支持计划对就业形势起到了支撑作用。如果发达经济体没有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失业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可能更大。

对经合组织的数据分析结果同样表明，某国的雇主所雇用的临时性工作者数量越多，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越高。这种收入差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尤其明显。这些国家为正式工作者提供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而对临时性雇佣合同的相应管理则较为宽松。

对策

经济的健康复苏以及就业机会的创造将降低青年失业率，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并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经济复苏并不足以使当今发达经济体中的很多年轻人避免受到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影响。

部分具有深远影响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基本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 解决学生所获取的技能与雇主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要实现降低青年长期失业率的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各项政策必须确保教育制度能够通过拓展计划、培训、学徒训练以及获得求职帮助等措施，让

年轻人具备雇主所需要的技能。政府可以通过采取部分措施，如降低雇主对新雇佣人员的社保缴纳金、和/或为那些雇用长期失业的低技能青年的企业提供补贴，以激励私营雇主雇用更多的年轻人。

- 减少对正式工作者的保障，同时增强对临时工作者的保障，以促进新增就业机会：一个普遍存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体系，该体系既拥有灵活的临时工作者群体同时也拥有一个具有高度保障的正式工作者群体，可能增加失业率（Blanchard 和 Landier，2002 年；Dao 和 Loungani，2010 年）。如果仅仅放松对固定期限合同的管制，可能增强正式工作者在工资协商中的影响力，从而推高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并使得其他人更难以受到雇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同时采取针对正式工作者和临时工作者的两个步骤。

- 促进竞争，创造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此类措施可以为新建企业创造各种行业的商机，推动创新，提高效率，进而刺激私人投资和就业的发展。各项政策应消除进入壁垒，减小在服务、零售、能源和电信等行业的经营限制。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建立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市场，可以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

上述改革措施并非都能立即取得成效，但它们对于应对长期失业问题必不可少。

年轻人的精力、技能和抱负是我们的宝贵资产，任何社会都不能浪费这项宝贵的资产。随着大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临长期失业的风险，长期失业对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收入、健康和福祉带来的潜在长期负面影响也将非常深远。此外，青年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包括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非常高昂。必须引入上述这些政策，来增强年轻工作者的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尽快加入劳动力市场。■

汉南·摩西（Hanan Morsy）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livier, and Augustin Landier, 2002, “The Perverse Effects of Partial Labour Market Reform: Fixed-Term Contracts in Fr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June), pp. 212–44.

Dao, Mai,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0, *The Human Cost of Recessions: Assessing It and Reducing It*,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10/1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Kahn, Lisa B., 2010, “The Long-Term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a Bad Economy,” *Labour Economics*, Vol. 17, No. 2, pp. 303–16.

Morsy, Hanan, forthcoming, “Un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in the Wake of the Crisis,”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on Wachter, Till, Jae Song, and Joyce Manchester, 2009, “Long-Term Earnings Losses Due to Mass Layoffs During the 1982 Recession: An Analysis Using U.S. Administrative Data from 1974 to 2004” (unpublish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玛特·沙菲克
(Nemat Shafik)
是IMF副总裁。

幻灭的理想

世界经济的复苏能力将决定当年轻人的未来命运

一年多前，突尼斯街头年轻的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 (Mohamed Bouazizi) 为抗议城管没收他的货品，转而在街头自焚，他所引爆的不仅仅是他所在国家的一场革命。他这一绝望的举动触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最终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阿拉伯之春”。“我认为，突尼斯这名青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原因并不是他失业了，而是他的理想被彻底毁灭了。”

这句话是一名肯尼亚年轻企业家去年9月份在参加IMF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时所讲的。他的话之所以令我印象至深，是因为它精辟地总结了年轻人如果无法找到工作可能最终付出的惨痛代价：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将一步步走向幻灭。

失落的一代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年轻人还是涉世未深的旁观者。然而，为那些导致如今困境的错误政策最终付出最大代价的，也很可能恰恰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必须通过纳税来为近年来积累的大量债务埋单。此外，欧元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部分国家的失业率仍在不断攀升，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年轻人（15—24岁）受到的影响最大，同时很多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也已达历史最高位。

如果不能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政策措施，我们就将面临失去经济增长的10年，同时还将面临出现“失落的一代”的风险。

看看下面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和希腊，接近一半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在中东地区，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失业青年人数占总失业人口的40%或以上，而叙利亚和埃及的这一比例接近60%。在美国这个一向拥有良好就业创造能力的国家，超过18%的青年求职者无法找到工作。

当经济增长放慢，青年失业率上升；与其他劳动力相比，年轻人往往更多地受

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作为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年轻人遭受的阻碍因素也最多。其中一个阻碍因素就是年轻人的工作经验相对较少，通常必须接受额外的在职培训。而当出现经济衰退时，这些年轻人往往受到更大的影响，当经济复苏时，雇主仍不愿雇佣这些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从纯经济角度看，由于辞退年轻工作者的成本相对较低，雇主解雇年轻工作者比解雇那些经验丰富的工作者也更加容易。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以及随后时期，上述因素似乎表现得尤其明显。

青年失业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丧失或退化，因此这将对经济增长造成长期负面后果，同时，还会对受失业影响的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其他众多不良后果。

这些不良后果包括：

经济成本加大：青年失业会导致社会增加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支出，减少收入所得税税收，以及生产能力的浪费。

人才流失：青年失业往往导致移民的增加，这种状况目前正在爱尔兰和冰岛出现，很多中东国家的情况也长期如此。很多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在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时往往会触发移民潮。

犯罪率增加：失业率上升往往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

终生收入的下降：青年失业常常会留下“工资伤痕”，导致收入的下降，并可能持续至其中年时期。青年失业的时间越长，所造成的影响就越大。

预期寿命的降低：青年失业通常会更多地导致预期寿命的降低，增加其在以后人生时期心脏病的发病率，甚至将增加自杀的可能性。

对IMF的启示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IMF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在上文提到的研讨会

上，其中一位参会者问我，IMF 是否真的关心失业和青年问题。

IMF 被赋予的权力是推动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事实上，在经济稳定性方面有很多因素对青年失业问题具有重大影响，反之亦然。

例如，去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对 IMF 具有很大的启示。在 2010 年以前，很多中东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相当可观——在“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前的三年内，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3%—5%。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似乎相当成功。但是，如果你避开这些数字，仔细分析社会不公平和失业等问题，显而易见，众多严重问题正日趋恶化。

因此，仅仅看那些总体的数据并不够。我们还必须分析导致这些数据背后的支撑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这些支撑因素而发生革命，显然这对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具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过去，IMF 并未特别关注就业问题。这也是我们与其他那些在这一重要领域被赋予特定权利的各方开展合作的原因。我们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利用我们的专长以便更好地了解哪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在更为务实的层面，我们还与 ILO 合作，帮助少数几个国家制定有助于政府、工会和私营部门推动新增就业机会的实施战略。

IMF 还与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的工会开展积极的对话。我们定期与国际工会联盟联系，并与经合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进行联系。IMF 成员国的代表团中大约 80% 的代表团定期与工会代表会面，深入了解各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

不过，IMF 能为降低青年失业率所作的最大贡献，是帮助其成员国恢复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复苏了，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工作。

创造就业的路线图

要使全球经济恢复至创造就业机会而非破坏就业的程度，必须采取众多举措。

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在 2008 年的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为避免经济萧条而增加了公共支出。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但人们对未来状况的担忧仍然持续存在。为需求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以及制定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未来状况信心的政策，将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必须利用有限的资金资源来维持和增强年轻人的技能。

在雇用年轻人方面，很多欧洲国家面临众多具有长期结构性的阻碍因素。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结构往往保护本行业内的工作者或企业。最终，缺乏国

内竞争阻碍了该经济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阻碍了其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能力。作为与成员国开展政策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IMF 正建议各成员国采取相关措施，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化、降低竞争的壁垒（特别是服务行业）、实施对增长有利的税收改革，以及加大在教育 and 研发方面的投入。显然，此类措施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但是必须尽快实施，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经济体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部分新兴经济体（至少直到最近）甚至面临经济过热的风险。其中部分国家（主要是那些对外顺差很大的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国内需求，以及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采购更多的产品，这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年轻人失业问题的解决。

低收入国家在 2008 年以后相对平安地渡过了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动用了大量的政府资源。目前，这些国家必须重建其财政缓冲器，以保持就业的发展，并将政府支出重新转向包括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高优先领域，即便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也是如此。

重新恢复信贷流

创造就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信贷的获取。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地区，信贷问题主要是银行不愿贷款。在美国，住宅市场持续不断的危机抑制了信贷的增长。在欧洲地区，银行面临巨大的主权债务风险。为应对这种状况，银行纷纷紧缩信贷，因此年轻的创业者首先受到影响也就不足为奇，初创企业就很少能获得贷款。

正因如此，必须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恢复其信心，以便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恢复借贷业务，促进经济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银行目前仍在开展借贷业务，但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和想要创业者，却无法获得贷款。因此，扩大信贷的针对人群，对于促进就业至关重要。

呼吁采取行动

2012 年，世界成百上千万的年轻人将处于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使世界经济步入复苏之路，未来状况将更为不利，更多年轻人的理想也将幻灭。要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恢复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为创造就业和信贷提供支持的政策同样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合作，所有这些目标都将无法实现。■

青年之声

如今全球青年人口达到历史高位，我们也见证着漂着的这代人。随着不少年轻人逐渐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学习一门手艺或者找到一份有保障且稳定的工作的梦想却变得难以企及。这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这代人迷失了自己。相反，他们一直遵循社会准则，期望获得经济独立和幸福的人生。他们在学校接受教育，希望成为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一员，然而工作岗位的匮乏或者现有工作岗位对技能的要求与其自身拥有的技能不匹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中的部分人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甚至出国，以寻找更好的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实却证明了他们的梦想虚无飘渺。

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各地的青年抗议经济机会的匮乏。很明显，体系已经崩溃，但是无人知晓该如何修复。以下是六个年轻人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青年的心声。



阿哈默德·哈桑，埃及开罗。

革命者，埃及

阿哈默德·哈桑本质上是一个革命者。然而这个年仅25岁的埃及年轻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的国家会爆发革命，而在2011年1月25日那天却发生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革命爆发的最初日子里在解放广场上要求提供安全保障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而这成为他恢复自信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哈桑说：“显然，我在革命之前是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但参加革命之后，我能够批评任何一位官员，并要求对那些我认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不好的事情进行变革。我将一直从自由当中汲取力量，继续到广场示威，直到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

哈桑在家排行老二。姐姐已经嫁人，这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弟弟即将从开罗的一家商学院毕业。他的父亲在他六岁那年去世，从此哈桑的母亲成为家里唯一的支柱。她在开罗最古老，同时也是最贫

困的地区——舒卜拉海租了一家小商店，靠卖蔬菜为生。

哈桑在父亲去世后一年便开始工作。他的母亲每天都让他到市场去上卖柠檬。哈桑会把收入的绝大部分交给母亲，自己留下一小部分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和衣服。

“我生来对生活就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一直以来，我就是周围环境和命运的囚徒，”哈桑沉思着。

哈桑的成绩很好，能够进入教育学院深造。然而，由于付不起学费，他勉强同意进入一家大专院校学习新闻专业，为期两年。

超过 25% 的青年失业率使得数百万的埃及年轻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极度匮乏。根据人口理事会 2009 年有关埃及年轻人的调查，15—29 岁的男青年中有 30% 想要移民，其中大部分是移往富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因为他们预期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哈桑原本也打算这样做，如果没有爆发 1 月 25 日的革命的话。

造成年轻人失业的部分原因是招工单位所要求的技能和青年所拥有的技能之间的不匹配。雇主们频繁地指出，求职者缺乏合适的技能约束了他们招聘人才。同时，那些高学历的青年失业率当前是最高的，这也意味着教育体系没能培育出拥有合适市场技能的人来。

哈桑说：“我很绝望。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因为和经理吵了一架，我被老板炒了。这位经理支持贾迈勒·穆巴拉克当总统，成为父亲的接班人。”当时，他在一家无线电话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24 天来我没有事做。我想过去国外旅行，直到听说年轻人打算在 1 月 25 日进行示威，”哈桑回忆说。“1 月 24 日那天，我来到广场和街道上，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发泄自己愤怒情绪的机会。第二天早上 7 点，我就来到广场，并一直呆在那儿，直到总统辞职。”

如今，作为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公司兼职摄影师的哈桑梦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受到警察的有尊严的对待。哈桑说：“导致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尊严、贫穷、腐败、操纵选举、任人唯亲和利用裙带关系的风气的蔓延。”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哈桑仍坚持为变革努力着。■

撰文：希沙姆·阿拉姆（Hisham Allam）；摄影：玛吉·奥萨玛（Maggie Osama）。

追寻自己的目标，波斯尼亚

厄琳·伯雷斯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职业目标，在波黑的最高形式法院任职。然而，从萨拉热窝大学法学院毕业两年之后，24 岁的厄琳仍在找工作、进行深造，与此同时，被退回来的求职信已经堆成小山了。

欧洲很多国家正遭受失业率高企的困扰，但对于波斯尼亚来说，高失业率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来自波斯尼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失业人口中 75% 的人已经失业至少两年，50% 的人失业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递交了 300 多份求职申请，”伯雷斯科说。“我曾多次通过初次选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没有一次获得一份工作。”波斯尼亚的失业率在欧洲是最高的。尤其是那些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近 50% 的人失业，他们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厄琳·伯雷斯科，波斯尼亚萨拉热窝。

伯雷斯科出生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并在那里上小学、中学和大学。她和妈妈、姐姐一起住在一所公寓里。在她努力学习以通过最终的司法考试期间，是她的妈妈和姐姐在经济上提供了支持。

伯雷斯科充满激情地说：“自从我进入法学院以来，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刑事法官。我认为我有充分的资格胜任，并处理哪怕是最严重的刑事案件。”

虽然目标远大，但伯雷斯科说只要是和法律相关的任何工作，不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好的起点，她都愿意做。伯雷斯科在萨拉热窝法院做了两年无报酬实习生，先是志愿者，随后能够领取伙食和交通补贴。在完成实习工作后，她并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一直以来她都非常积极地寻找工作。

伯雷斯科认为，教育体系在按照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来调整应授予学生的技能方面表现很差。她认为有太多的律师和经济学家。IMF 的一项研究支持了她的这一观点：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是阻碍一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约 2/3 的中学生在职业学校或技校注册，而这些学校提供的项目非常有限，有些甚至过时了。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缺乏一些重要的技能，包括沟通、问题解决、团队合作，而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上最需要的。

作为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波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一次巨变。1992—1995 年的战争导致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基础设施被毁，GDP 下降了近 80%。《1995 年代顿和平协议》终止了这场战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而该体系却经常由于有关种族问题的政策而陷入困境。“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情况，”伯

雷斯科说。“对于像我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并且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投入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渺茫。想要在一个经济不够强劲、政府机构薄弱的国家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伯雷斯科还谈到了腐败。在她的祖国，腐败对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包括失业问题。“当时，大多数人都是依靠裙带关系而不是自身的优势来获得工作机会。在多数情况下，为了得到工作，年轻人被逼行贿，”她说。

伯雷斯科希望在三月份的时候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她还会继续找工作，并希望自己的努力最终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撰文：黛瑞尔·斯多—苏斯科（Daria Sito-Sucic）；
摄影：德多·鲁维科（Dado Ruvic）。

被延期的抱负，秘鲁

在利马市郊贫瘠山丘上的贫民区里，男男女女等着装满塑料盛水桶的蓝色卡车，他们必须顶着烈日将这些塑料桶拖上长长的阶梯。

2000—2010 年，秘鲁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5.5%。长达 10 年的繁荣大大降低了该国的贫困率，但却没有光顾 Flor de Amancaes，这个在岩石斜坡上布满刷着明亮油漆却脆弱的小木屋的地方。

“对于某些人而言，我想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了，但在这里你却看不到这种情况，”艾迪梅尔·加西亚（19 岁）仰望着山丘上那些只有一个或两个房间的居民屋这样说道。



艾迪梅尔·加西亚，秘鲁利马。

尽管秘鲁近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

加西亚在 15 岁时到位于秘鲁北部的皮乌拉山的自家农场帮工。在他看来，这个地方是不断扩张的首都利马的一部分，拥有光明的前景。四年后，他们搬家来到城市，家仅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板房，位于城市的边缘，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市政供水。

“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和学习，”他说。“我曾经认为这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也有更好的机遇。”然而城市生活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成为现实。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和兄弟们住在一起，并在两个月之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是一周六天的全职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学业，而且他也无法再返回学校上学了。

最近，他在离家一小时路程的中产阶级社区的一家玻璃刀商店打工，每周工作 60 个小时，报酬是 75 美元，但没有任何保险和福利。不过在 2011 年年底，工作没了，他又开始继续寻找工作。

这一次，加西亚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让他有半天空闲时间（上午或下午）的工作，这样就能够去上学，但连他自己都怀疑能否找到这种工作。“工作是可以找得到的，但却很难找到愿意给你时间去上学的工作，”他说。

加西亚并不确定自己要做哪种类型的工作。“我想完成中学课程，”他说，“然后再看自己喜欢干哪一行。”虽然他的抱负被延期了，加西亚并不后悔搬到城市来。

“只要你工作，你就能挣到钱，这是在这里好的一面，”他说。“在农场，虽然你工作，但却拿不到钱。”加西亚并不孤独。在过去 20 年里，每年有近 130000 人涌向利马，现在利马已经成为拥有 760 万人口的城市。

利马原本是建在秘鲁沿海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而随着一次次居民对土地的新的要求，它早已向东朝着安第斯山山脚的岩石地区延伸，到陡峭贫瘠的山坡。居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但改善的速度却远远低于该国 GDP 的上升曲线。

谈起 Flor de Amancaes 时，加西亚说：“四年前，这里没有阶梯”通向山坡。“甚至没有路，有的仅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汽车开不上来。当时的房子更小，现在都已经改造过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里，见证了它的发展。我希望这一发展能够继续下去。”然而，他自己的梦想仍然遥不可及。

“也许在将来，我们这里通水、通电了，到那时，这将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他这样说。“将来我想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过现在我只想工作和学习。”■

撰文：芭芭拉·弗雷泽（Barbara Fraser）；摄影：奥斯卡·梅德拉诺·佩雷斯（Oscar Medrano Pérez）。



亚莉克莎·克雷，美国华盛顿特区。

行动起来，美国

2008 年 9 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全球经济混乱，当时克雷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感到绝望。她刚刚在牛津大学完成了自己有关经济学的研究生论文，正是时候开始行动起来。

“我不认为自己是抗议者，”克雷这样说，虽然她参加了“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运动——年轻人以及其他民众组织起来，反对全球经济下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这并非是一项反动主义活动，不过它也确实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今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在经济中起到作用，进行改变，而不是麻木地被动接受。”

克雷认为，如今的青年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企业家精神以及来自于他们的职责的认同感。

“通过努力改变而了解自己，我想这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这样。”

克雷并不认为自己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受害者。现年 27 岁的她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经历了自从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的稳定就业情况——在此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从 6.5% 升至 10%（2009 年 10 月）的高位，随即又缓慢下降至 8.5%（2012 年年初）。

目前，这位自称游民的女子在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实现社会改革。最近，她去了肯尼亚和卢旺达，研究当地的青年失业和就业创造情况。她马上还会去印度，对非正规经济进行研究。

克雷可能在危机期间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她十分清楚年轻人在求职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我们必须更有创意和斗志，要自己为自己创造就业机会，要知道工作可不会从天而降。”

她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全球各地的抗议活动给民众表达对当今经济体系的强烈不满提供了空间。但是，她批评说这个运动“缺乏我认同的改变的论调”。

经济学已经和重要的实际问题脱离开了，克雷说：我们应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经济繁荣的条件是什么？

“经济理论趋向于自我参考型，并远离大多数民众，”克雷说。她希望从业者能够用更加民主的形式与大家沟通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已变得非常复杂，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到有关经济的讨论之中。”

克雷指出，市场自我调节的主张和个人以自我利益为重的行为在危机期间对经济的发展都没什么用，同时经济学家们现在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以及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民众表达对现有行事风格的不满提供了渠道，然而克雷希望进行更多的有关采取另一种行事方式的对话，包括与当权者的对话。

“占领华尔街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市民成为推动未来经济格局行成的真正的改革者，而非仅仅是对此次危机不满的抗议者。”■

撰文：杰克琳·德斯劳瑞尔（Jacqueline Deslauriers）；
摄影：史蒂夫·加菲（Stephen Jaffe）。



佐藤拓海，日本东京。

迷失和孤独，日本

佐藤拓海仅靠每天一包方便面活着。他说如果再收不到日本政府提供的残疾人支票的话，自己就将无家可归了。

“我是在科技大学学电脑游戏设计和生产的，毕业之后在一家制作电视动画和视频节目的电脑公司担任助理导演。”23岁的佐藤目前一个人住在东京以北的川崎市的一间公寓。这间公寓只有一个房间。

“但这并不是一个全职工作。尽管如此，我每天也必须工作八个小时，而且我和公司之间并没有签什么合同。”佐藤说道。

这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工作者的现实写照。由于过去几年间的经济下滑，公司的经济拮据，因此放弃了国家鼓吹的终身雇佣制和精心培养公司家庭式温暖的理想。相反，工作者们签订的是短期合同，这使得雇主所受限制更少，而工作者却没有任何保障，四处漂泊。

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其社会安全网也在恶化，仅有23%的失业者符合福利发放要求。脆弱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关支持服务的缺失导致人口的健康状态下降，甚至是自杀。

佐藤的下一份工作是为超市和便利店准备便当，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月工资13万日元（1671美元）。这份工作他只干了两个月。

医生告知佐藤应该停止工作，以防止他的心理健康进一步恶化。随后，佐藤便辞去了这份工作。

这是发生在三年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佐藤依靠政府提供的每月11万日元（1413美元）生活，而每个月的房租就会花掉3.5万日元（450美元）。

政府为了让公司摆脱全球经济风暴而使劲浑身解数，但却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视而不见。佐藤对此非常气愤。

“他们所做的并不够。他们甚至不在乎公司粗暴对待员工的情况，”佐藤说。“他们只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们还认为雇用外籍劳工的成本更低（这些外籍劳工的要求更少并且对工作条件不会有什么抱怨），“即使他们清楚这样做很容易触犯移民法律。”佐藤说道。他之前工作的那家便当公司就引进了更多的巴西人和印度人。

根据日本一家致力于无家可归者的非营利机构Moyai的调查，日本有110万人的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25706美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连房租都付不起。该调查还显示，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一个极端的现象出现了，就业情况导致青年退出社会，他们通常从极度孤独和封闭中寻求庇护。他们

当中的很多人几个月，有时是几年，都不愿出门。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专属名称——“蛰居族”，意思是“宅在家里”。

“政府说，如果我们继续工作的话，只要再多努努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佐藤说，“我觉得我正在脱离这个社会，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撰文：朱利安·莱亚尔（Julian Ryall）；
摄影：阿尔菲·古德里奇（Alfie Goodrich）。

不匹配的技能，尼日利亚

和成千上万她这个年纪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吉奥玛·尼瓦索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两年前她刚毕业之后，尼瓦索耶干了一年的国家义务服务工作。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找工作。

23岁的尼瓦索耶有四个兄弟姐妹。她在2010年毕业于达尔塔州立大学，获得地理和区域规划学位。她说，“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学习的专业。我更想读会计或者商科。”

由于当初的分数不够进入会计系，她选择了在该大学读一年预科，以保留她的入学资格。但是那年的预科项目“并没有提供进入会计系的机会，所以我选择了地理学，”她这样说道。然而在下一年，预科班又有了进入会计系的机会，这件事让尼瓦索耶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每年有近100万人参加尼日利亚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为了争夺该国95所公立和私立大学的10万个入学资格。因此，大多数年轻人同意接受任何学科的学习，就像尼瓦索耶所做的那样，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有机会获得大学学位。

尼日利亚每年有成千上万个大学毕业生，但多数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和市场上要求的技能不匹配。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缺乏资金而导致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缺少合格的教师。部分雇主抱怨说很多毕业生不具备所学专业的核心专业知识。

尼日利亚这个位于非洲的人口大国，其失业率日益上升，目前已达到了24%。接受高等教育并没有提高找到工作的机会。10个毕业生里就有三个失业。

尼瓦索耶赢在了起跑线上。她的母亲是小学教师——这在她所生长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萨佩莱来说并不常见。根据北部教育倡议（该地区的一项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计划），在萨佩莱有43%的适龄女孩失学。



吉奥玛·尼瓦索耶，尼日利亚拉各斯州巴达格瑞。

在尼瓦索耶生长的尼日利亚南部地区，情况要好一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15—24岁女性的识字率只有65%，而该年龄段的男性识字率为78%。

由于从小对数字很感兴趣，“我的父母，特别是我母亲，非常希望我能够学医。尼瓦索耶解释说：“在尼日利亚，部分课程受到人们的追捧。人人都想成为一名医生或者会计师。”为什么呢？“我觉得是经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学医或会计的人在毕业后能很容易找到工作。”

目前，她决心攻读硕士学位，好让他父亲开心。尼瓦索耶的父亲在尼日利亚国有电力公司工作。

她说：“一直以来，我的父亲就明确要求我们都必须要读大学，而不是技校或大专。实际上，他命令我们一定要取得硕士学位，免得他抱怨我们只有大学学位。”

在这个有4000万失业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重新接受初等教育而导致失业）的国家，很多人都没有进行继续教育以避免失业的机会。■

撰文：威尔·法塔德（Wale Fatade）和图鲁·欧甘勒斯（Tolu Ogunlesi）；摄影：茵卡·欧鲁巴德（Yinka Olugbade）。

人民币能否称霸世界？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叶雷

虽然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正变得日益重要，但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对美元构成挑战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全球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中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10%—15%（取决于不同的测定方法），而在 2011 年，其在全球 GDP 增长中所占比重约为 1/4。但是，在全球六大经济体的货币中，人民币是唯一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可自由兑换和广泛接受的货币——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并非是一种硬通货。

最近，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交易的结算货币——尽管中国一直无意为自由资本流动而开放其经济并允许其汇率变得更加灵活。然而，鉴于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及在全球生产与贸易中的份额日益上升，上述措施预示着人民币将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否会上升到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地步——或许接近美元的地位。

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该货币的三种互相关联却又各不相同的设想：

- 国际化：将其用于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和结算，即作为一种国际交易媒介。

- 资本项目可兑换性：表明中国对金融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水平——一个毫无限制且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以及

- 储备货币：外国央行是否会持有人民币，以防范国际收支危机。

即使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并

未完全开放，其货币仍然可以成为国际交易的结算货币。而反之，即使并不存在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措施，一个国家的货币也可能很少或根本不被用于国际交易的结算。但是，如果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那么用于国际交易结算和资本项目开放是两个必要条件。

本文将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全球货币系统的相应影响，对人民币上述三个方面的每一种可能性进行现状和前景评估。

成为储备货币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前景，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最终必将成为一种储备货币。为了判断其可能性和时机，有必要对储备货币的典型特征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就上述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影响货币储备地位的常见因素包括：

- 经济规模：一个国家的 GDP 及其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所占的份额是一个国家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 宏观经济政策：对一个国家主权资产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必须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保护货币价值不会遭受侵蚀的能力充满信心，尤其对该国致力于低通胀和可持续公共债务的承诺方面有信心。

- 灵活的汇率：储备货币通常可自由交易，且其对外价值由市场决定，尽管这并不完全排除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行为。开放的资本项目并非等同于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

- 开放的资本项目：储备货币必须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合作伙伴所接受的支付手段，这就要求这种货币必须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自由交易。假如一个国家对资本流动施加限制，而且假如该国外汇市场十分薄弱并处于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便难以实现这个目的。



• 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具备深度和充足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即包含众多购买者和销售者的市场，尤其政府债券市场，以提供“安全”的资产，供国际投资者和其他国家的央行购买持有。这些债券市场的成交量（交易总量）作为衡量流动性的一项指标，也同样重要。

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硬性规定，可以用来判断上述哪些因素具有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作用。例如，尽管瑞士占全球 GDP 和贸易的份额较小，但瑞士法郎仍然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此外，许多重要储备货币的经济体——例如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有巨额且日益攀升的公共债务，这无疑为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至少迄今为止，尚未对其货币的储备地位造成任何影响。实际上，一些分析人士根据美国的经历得出的推论是，中国要想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提供储备资产，必须背负高额经常项目赤字。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和瑞士的货币获得了储备地位，但上述国家却持续保持了经常项目盈余。

人民币如何发挥作用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已人尽皆知。如今，中国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份额为 10%，比 10 年前增长了 4%，而且，通过贸易联系与其他经济体也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实现长期通胀预期并培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相对于重要储备货币经济体而言，中国拥有中等水平的明显公共债务和较低的政府预算赤字。而且，尽管中国对汇率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无疑使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然而，就在不久之前，中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有意开放其资本项目。尽管中国依然对资本实施广泛的控制，但正在有选择性并审慎地放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因此，在过去的 10 年中，总的流入资本出现了大幅剧增，这无疑说明中国作为国外投资目的地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外汇储备以外的流出资本，如中国企业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国外的投资已出现了大幅增长，尽管基数较低。简言之，中国的资本项目实际正在变得日益开放，尽管从这个角度看与储备货币经济体（欧元区、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的资本项目相比仍显得不够开放。

对于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而言，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种储备货币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声望，都不乏各种独特情况的作用力和千差万别动机的推动力，但确定的一点是，这个过程始终需要强有力的金

融市场的支持。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方面包括：

• 广度：各种各样金融工具的可及性，其中包括套期保值风险市场；

• 深度：拥有针对具体市场的大量金融工具；

• 流动性：较高水平的成交量（交易总量）。

如若缺乏一个足够庞大的债务市场，人民币将无法令人信服地用于国际结算。如若由人民币计价的债务市场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对于外国企业而言，该货币也将不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如果无法进入衍生品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进口商和出口商或许都将对资本项目开放造成的汇率波动性增大状况感到担忧。

问题的症结何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依然由银行所主导，而政府对大多数的银行系统则拥有直接的管辖权。由银行部门所发放的国内信贷总规模超过了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的总和。银行系统的规模和结构旨在通过限制竞争来保护银行的利润，再加上监管壁垒，无疑抑制了金融市场向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

就规模和流动性而言，中国的债务市场远远地落在了重要储备货币经济体的后面（见图 1）。按绝对价值计算，政府债务市场的总额相当大，但成交量却很低。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的成交量相对较高，但总额依然很小。根据发行货币来分析其国际债券中所占的份额可得出相似的结论。现有的储备货币占有主导优势；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在国际债务市场中的份额仅为微不足道的 0.1%。

从跨国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债券市场的绝对规模较小，但不应对这些市场的快速增长有所忽视，这种快速增长无疑符合该国欲使人民币成为各国所认同的国际货币的想法（见图 2）。然而，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可能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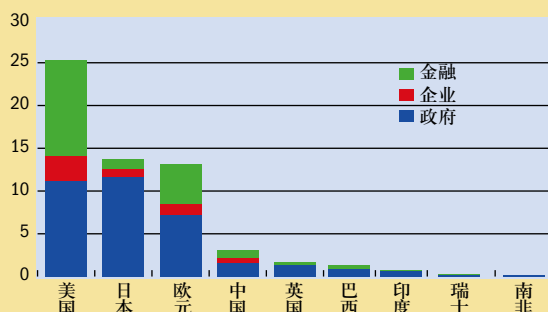
中国取得巨大进展的一个领域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图1

与重要经济体相比仍大幅落后

与重要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债务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仍大幅落后。

（未清偿国内债券，万亿美元，2010年）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表显示的是按照所在国和发行部门划分的未清偿国内债务的数量。欧元区数据中不含爱沙尼亚的数据。

在 2005 年进行改革之后，市值和交易量大幅攀升，增长了六倍之多，而与此同时，交易总量增加的幅度则超过 10 倍。然而，中国股票市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极易受到对企业治理的担忧情绪的影响，因此其对于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作用可能十分有限。

中国货币国际化的步伐取决于其国际金融交易——而非仅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情况。对于某一货币作为媒介货币在涉及跨境商品贸易和金融资产交易中的潜力而言，外汇市场交易量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在 2010 年占外汇市场总交易量的比值不到 1%，但是这一数字低估了现实情况。中国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进行外汇交易的结算，而在 2010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的占比为 5%。香港特别行政区提供了一个大有裨益的平台，就获得国际货币地位而言，通过这个平台，人民币具备了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的竞争性优势地位。

中国大多数的衍生品市场依然十分稚嫩，但是根据期货和期权合同交易的数量来衡量，中国的三个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位列全球衍生品交易市场 20 强。然而，从提升某一货币的国际结算地位的角度来看，大型商品衍生品市场的作用仍不及更加多样化且流动性更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金融活动的政策正在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实施者通常是生机勃勃的国内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一年中，人民币存款总额和获得授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机构数量大幅增加。

增加人民币离岸结算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又不会造成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潜在有害影响的风险。但是，假如不致力于更加积极的在岸发展，便无法发挥中国货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全

部潜力。而且归根结底的是，如若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大幅自由化，将很难充分发展外汇和衍生品市场。

总之，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金融市场在广度、深度和流动性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内容而言，中国依然显得能力不足，而金融系统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也有可能阻碍其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步伐。

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

尽管支撑人民币的金融基础设施较弱，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却日益增强（见图 3 和图 4）。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试验场，以测试旨在提升人民币国际结算地位的各项方案。2004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出了人民币个人业务，藉此，香港居民可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此后相继采取了其他举措，如跨境贸易往来的结算和人民币债券的发行。

鉴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总量，提升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地位是在朝向人民币国际化迈进的过程中符合逻辑的第一步。自 2009 年开始实施跨境贸易结算以来，中国货币的跨境贸易结算大幅攀升。2011 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达到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的约 8%。仅在 2011 年的一个月之内，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跨境结算的人民币月付款几乎达到 250 亿美元，超过 2010 年平均水平的一倍还多。

同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被称为“点心债券”）也日益上升，从 2007 年至 2010 年增长了 2 倍，而 2011 年第二季度则达到了约 100 亿美元的高位。在这些债券中，很少有在 2011 年的其他时间内发行的。这无疑说明，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全球市场环境日趋疲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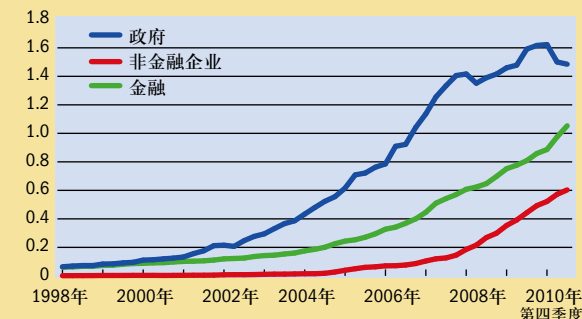
衡量人民币离岸结算的另一途径是查看银行间的

图2

迎头赶上

虽然绝对值较小，但中国债务市场的增长速度很快。

（未清偿国内债券，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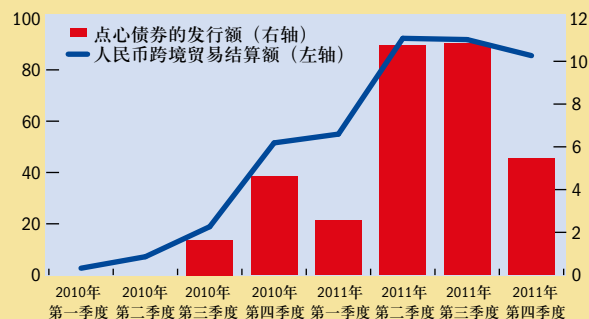
注：数据截至2011年9月（含）。

图3

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点心）债券，并以人民币进行贸易交易的结算。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彭博资讯；作者的计算。

交易。在2010年年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机构才获准开设人民币结算账户，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此类的人民币结算交易。自那以后，无论交易的总量还是交易的价值都出现了大幅增加。2011年8月，交易的总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尽管其规模依然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各种因素已经得以启动并正在进行快速的扩张，这无疑预示着人民币将在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一些人或许会反驳说，人民币点心债券的发行和跨境结算的范围仍然较小，而且大部分的此类活动都是中国大陆的公司和其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子公司之间进行的。一些此类的活动也可能反映出规避资本控制的企图。简言之，即使就离岸人民币结算的影响而言，如要发挥其全部的潜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中国央行正在与世界各国央行签订和拓展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促进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结算作用。上述双边协议所涉及的金额较小，但是这些协议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让其他国家的央行适应并熟悉以人民币计价的工具和融资机制。

人民币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产品组合中。2011年，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首先表示进行人民币储备。如今，在智利央行投资组合中，有0.3%的资产属于以人民币计价的工具。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正在考虑在其储备组合中增加人民币资产。鉴于人民币缺乏可兑换性，上述对人民币的持有原则上并不算官方储备，但是上述央行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它们将人民币资产——如同其他重要储备货币资产一样——视为应对国际收支平衡压力的保护手段。

上述行动的规模均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预示着对人民币稳定性和其在国际货

币系统中未来作用的想法上的转变。

与美元一决雌雄

人民币是否一定会取代美元，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或许会，但是这一天仍然遥遥无期。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未来10年中，人民币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这将削弱美元的地位，但不会取而代之。

如今，世界上约有2/3的外汇储备均以美元金融工具的形式持有。其他指标——如美元在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的份额、非美国银行的跨境外币负债——均印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中无可质疑的主导地位。然而，人们对美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担心日益强烈，这种担心可能会影响美元的受欢迎程度。尽管美国央行，即联邦储备局，在抗击通胀能力方面拥有强大的国际公信力，然而公共债务的不断攀升成了人们深切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约占GDP的90%，而根据IMF的预测，到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将可能达到GDP的110%，或约21万亿美元。对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形势无疑十分危险，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债务的日益攀升或许会巩固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鉴于日本和欧元区的力量较弱，且随着新兴市场持续积累外汇储备，他们对所谓安全资产的需求日益增加。

况且，就安全和可流动的资产（如政府债券）而言，中国与美国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仍然无可匹敌。中国所要做的并非是增加债务以便赶上美国的水平，而是发展其他的金融市场并增加高品质人民币资产的可及性。

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人民币正在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尽管这种重要性势必将与日俱增，但人民币不太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更不用说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了——除非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且中国采取开放资本项目的做法。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进行大幅的国内改革，以对其审慎的国际政策行动提供支持。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景将受到更广泛的政策的影响，尤其与金融市场发展、汇率灵活性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关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和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将取决于上述政策选择。■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是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托兰尼（Tolani）高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学新世纪教授。叶雷（Lei Ye，音译）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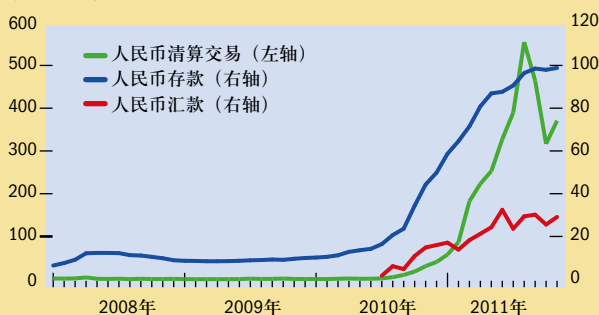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一篇名为“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角色”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论文。

图4

银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银行间离岸人民币存款、汇兑和结算交易情况远远超出2008年的水平。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香港金融管理局。

整体性保护

不仅需要保持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而且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更为广泛的“宏观审慎”方法，以保护整个金融体系。

路易斯·I. 杰克姆、俄尔恩德·W. 尼尔

长期以来，政府不遗余力地监管金融机构，以确保金融机构的安全、健康及履职尽责的能力——针对那些依靠民众筹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等机构尤为如此。但是，正如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传统的监管办法（常被称为“微观审慎”）并不足以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

传统的监管办法对主要面向批发市场运营的投资银行而言往往较为宽松，因为零售储户面临亏损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微观审慎的政策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视为单个健康机构的总和。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如下因素，即对于某种行为而言，即使从一个机构的视角看是审慎的，而当所有的机构都从事类似行为（无论是通过销售可疑资产、收紧信贷标准，还是一味紧守现金）时，也可能造成诸多问题。同时，微观审慎的监管办法通常也无法认清以下事实：某些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均可形成威胁，而许多大型的金融公司正是凭借这些市场来筹集和投放资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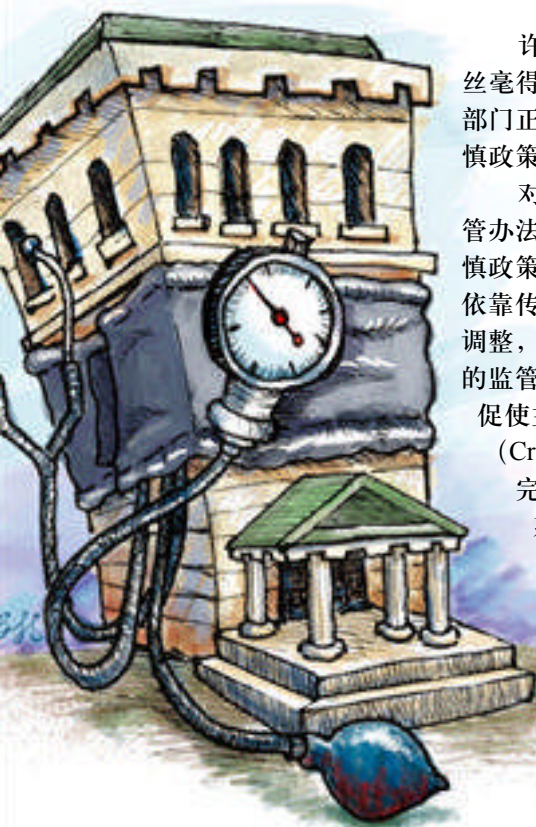
更加广泛的办法

许多国家的主管部门日益认识到，传统的监管办法使得金融脆弱性的发展势头丝毫得不到遏制，结果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基于此项认识，这些国家的主管部门正在探索一种更加系统性的金融监管办法。这种整体性的办法被称为“宏观审慎政策”。

对于针对诸如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健康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监管办法，宏观审慎政策并不寻求对其加以取代；恰恰相反，宏观审慎政策对微观审慎政策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经常性地部署传统监管工具，并依靠传统的监管者来贯彻和实施监管措施。但在使用上述工具时，它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抵御金融体系中日益增长的风险。这种不断完善的方法或许需要一种新型的监管体制来对金融体系进行监测，从而发现金融稳定性风险日益增长的迹象，并促使主管部门采取行动，应对上述风险。宏观审慎的方法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概念（Crockett, 2000 年）。但是，只有在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决策者们才逐渐完全认识到现代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混乱的可能性和它所导致的代价以及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因此，这种办法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金融稳定委员会 /IMF/ 国际清算银行，2011 年）。

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范围

宏观审慎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确定并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所面临的风险，从而减轻金融服务混乱给经济造成的高昂代价，因为金融服务不仅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如提供信贷），而且对保险和支付及清算服务的运营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稳定委员会 /



IMF/ 国际清算银行, 2009 年; IMF, 2011a)。

“信贷紧缩”便是此类混乱的一个实例。在信贷紧缩中, 银行和其他贷方蒙受损失, 致使面向家庭和公司的信贷大幅削减, 这无疑又抑制了整个经济活动。

产生此类混乱的根源要么是金融部门的整体性或总体性缺陷, 要么是所谓具有系统性的单个金融机构(与其他诸多机构存在财务关系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当金融部门从整体上过多地面临同样的风险时, 便会产生总体性缺陷——无论这些风险是信贷风险(借款者无法偿还)、市场风险(抵押品价值下降), 还是流动性风险(资产难以售出或债务再融资难度增大)。例如, 在最近这场危机发生的前期,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信贷与房地产抵押品的价值联系日益紧密。当房屋市场崩溃时, 借款者因为房地产价值下降而面临着市场风险, 同时又因为其偿还贷款的能力减弱而又面临着信贷风险。此外, 为了出借资金, 许多国家的信贷提供商越来越多地从批发市场(如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借取资金, 从而对客户的传统存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当上述市场枯竭(尤其自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之后, 借款者因无法对即将到期的债务进行再融资而面临着流动性风险(Merrouche 和 Nier, 2010 年)。

假如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着上述风险来源, 或与上述风险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许多或所有的金融中介(如银行和其他贷方)便可能承受压力, 因为资产的价值在下降, 而更换可贷放资金(负债)的成本却在上升。这无疑将损害整个体系提供关键金融服务的能力, 其中包括面向经济体的信贷和款项支付。

单个金融机构的破产可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当它对其他金融机构继续向整个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产生破坏作用的时候。只有与其他许多机构具有十分密切联系的大型机构, 才能导致上述溢出效应的产生, 因为其本身的破产会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通过下列四种蔓延途径中的一种或多种, 则会引发上述溢出效应:

- 其他金融机构受到破产机构的直接影响;
- 破产机构廉价出售资产, 导致所有同类资产价值的下降, 迫使拥有此类资产的其他机构蒙受损失;
- 其他金融机构对于破产机构所继续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依赖性, 如信贷、保险和支付服务; 以及
- 在该机构发生系统性破产之后, 导致其他机构的融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上升(Nier, 2011 年)。

例如,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不仅导致其他金融机构的直接损失, 而且致使所有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出现了大幅跃升, 因为对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究竟会在哪些领域引发后续的亏损, 资金提供商并不十分确定, 因此无论对任何机构出借资金, 都抱着万

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确保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总体性缺陷和单个系统性机构破产所导致的预期成本, 它必须将两类公司纳入其政策覆盖的范围——系统性机构和所有的杠杆信贷提供商(利用借取的资金发放贷款)。

系统性机构不仅包括大型银行, 还包括那些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至关重要的支付和保险服务的机构。例如, 美国国际集团(AIG)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险服务, 以保障这些机构所持有的与抵押品相关的证券的价值。假如允许 AIG 破产, 那么这种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将会消失, 其他机构便会面临巨大的损失风险。

所有杠杆式信贷提供商——无论规模大小——都属于宏观审慎政策所涵盖的对象, 因为其集体性的缺陷可影响其对整个经济的信贷供应(Nier, 2011 年)。尽管银行几乎始终是最重要的杠杆式信贷提供商, 然而也必须将某些司法管辖区重要类别的非银行借贷机构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范围, 否则就会产生如下风险: 提供信贷的责任将由银行转移到受约束较小的非银行机构。

实际政策

宏观审慎政策必须部署一系列的工具, 以应对总体性缺陷和单个机构的破产。因为单个的工具可能不足以应对各种各样的系统性风险来源, 宏观审慎政策的主管部门必须能够根据自身的分析, 针对所确定的特殊脆弱性量身定制具体的宏观审慎工具(Lim 等人, 2011 年)。

目前, 正在开发多种工具, 最近已经将某些开发的工具用于解决随时间而积聚的合计风险。其中一项重要的工具是“动态资本缓冲”。长期以来, 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维持一定的资本额度(通常是股票和留存收益), 以吸收(或缓冲)贷款或证券的亏损。动态缓冲(由在瑞士巴塞尔的与会国际监管专家组提出)将引领宏观审慎政策主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提出要求: 当有迹象显示出现信贷异常猛增时, 或有迹象显示出现了由信贷拉动的资产价格猛增时, 必须增加其资本额度。资本缓冲的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贷方机构必须筹集代价更加高昂的自有资金, 信贷的成本无疑会上升, 而信贷的增长则会减缓。与此同时, 此缓冲机制应当增加金融体系的弹性, 以确保金融体系在高涨转向萧条时更好地吸收所有的亏损。这无疑又会降低代价高昂的信贷紧缩的发生机率。

这种动态或反周期的资本缓冲仅仅是宏观政策主管部门针对具体脆弱性所能采用的众多工具之一。在过去, 为防止繁荣—萧条信贷周期的出现, 曾经用到了其中的许多工具(尤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同时

也纳入了其他工具，以应对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限制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率）以及随着信贷强劲增长而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的增加（如采取措施，防止对脆弱的批发融资过度依赖）：

- 部门风险权重的变动：旨在发挥比动态资本缓冲更为直接的作用，迫使金融机构增加资本，以应对向正在积聚过度风险的部门发放的新贷款。例如，土耳其最近提高了向住宅市场发放新贷款的标准，以遏制这一细分市场贷款增速过快的现象。

宏观审慎政策必须部署一系列的工 具，以应对总体性缺陷和单个机构 的破产。

- 动态准备金：这些措施迫使银行预留资金，以弥补经济繁荣时期为数不多的贷款亏损。这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才能处于更好状态，以便随时吸收萧条时期所造成的亏损。西班牙于 2000 年推行了动态拨备机制，不久前，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也推行了这一机制。

- 贷款价值比率：如今，限制贷款价值比率的做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以减少房地产市场繁荣—萧条周期的系统性风险。限制贷款价值比率以限制贷款额度，使其远低于房产的价值，有助于限制住房的杠杆作用。此外，他们也可对激增的住房价格采取抑制措施，并在房地产市场周期逆转时，减少负资产住房被迫违约的机率（IMF，2011b）。债务收入比率常常对其形成有益的补充，旨在对花费在清偿债务上的家庭收入额度进行限制。

- 针对外币借款的措施：假如借款者所借贷的是外币，那么如若该外币价值上升且他们没有事先针对这一后果采取保护措施，他们的还贷能力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外币价值上升的威胁增加了贷方的信贷风险，因为对于借款者而言，清偿变得更加昂贵了。旨在降低此类风险的宏观审慎措施包括：针对外币贷款实施产品组合限制，同时施行其他的针对性限制措施，如要求具备更多的资本及针对外币贷款实行更加严格的贷款价值比率和债务收入比率要求——最近，新兴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采取了这一办法。

- 流动性要求：当融资较为容易时，如若增加所需的流动资产缓冲（可被容易而快速地转化为现金的资产），则在融资枯竭时，这些资产便是可供利用的现金储备。流动性要求的增加随时间而变化，这种办法还可抑制由短期和脆弱的批发融资拉动的信贷扩张，从而降低对此类融资依赖的危险性。最近，新西兰和韩国推行了这种措施。

- 同时，主管部门也需要随时能够应对因单个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破产而引发的风险。目前尚在讨论之中的大多数此类工具均可降低某些极其重要而不能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性。最近，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于 2009 年的一个国际监管机构）宣布，对世界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些金融机构——主要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业务运营的银行和大型投资银行——将必须遵从更高的资本额度要求，具体数额须与该机构对全球金融体系所构成的风险水平相关。这些额外的资本要求将有助于抑制此类金融机构的增长，并使其作出更加充分的准备，以随时吸收亏损。尽管如此，旨在降低单个系统性金融机构因破产而引发的影响的其他工具也将有所帮助。例如，当一些金融机构与大型的系统性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系时，要求前者维持更多的资本，似乎是具有充分依据的，因为正是这种业务联系才会传递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所引发的效应。另一项具有强大潜在作用的工具要求提高上述业务联系的透明性，其中包括衍生品市场中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以期减少不确定性，并藉此减少单个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破产对整个市场造成的影响。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后，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冻结。

发挥实效的宏观审慎政策

由于宏观审慎政策尚处于实施的早期阶段，若要真正充分地发挥实效，它必须面对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构建（或改进）其制度支持；
- 设计一个分析框架，有效地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以便对相应的政策行动提供指导；以及
- 建立国际合作。

制度支持：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度基础设计应当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制度实施起点的差异性。尽管如此，对于所有的国家而言，一些总的目标是相同的。这些方案应当能够促进对发展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甄别；确保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以促使金融机构采取及时而有效的行动抵御上述风险；并有利于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影响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协同（Nier 等人，2011 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所建立的体制应当避免采用复杂且过于分散的结构。假如存在许多参与者，制度冗余和对立可对风险甄别及系统性风险缓解产生抑制作用，从而破坏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此外，为了创建强有力的行动激励机制，此框架应当确定一个发挥领导作用的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和相应的权力，以便使其负责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所有的方案中，独立的央行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央行不仅在风险评估方面拥有专长，而且作为向面临

流动性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最后贷款人，央行也会主动地及时采取行动，降低日益增长的风险。此外，央行另一项强大作用是促进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这无疑创设了影响信贷需求和供应的整体环境。政府的参与十分有益，可确保对税收政策提供支持，并促进所需的立法变革，以使主管部门降低系统性风险，如针对非银行贷方机构和其他系统性机构成立监管部门。但是，由于政府具有政治性质（如若发挥过多的作用），可能引发许多风险，因为政府往往倾向于反对在经济繁荣时期采取宏观审慎措施，而实际上，在经济繁荣时期往往最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衡量系统性风险：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使其在早期有效地确定系统性风险，并促使宏观审慎政策的主管部门采取及时而适度的行动。对此，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以便为整体系统性风险（其可触发宏观审慎工具的采用）制定一个统一的指标。尽管这样的一种指标颇具吸引力——因为这种指标方便沟通，也可轻松用于衡量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但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工具。

决策者们转而尝试应用一组指标（IMF，2011c）。这种办法认识到，系统性风险不止一个维度。更多的信息也有助于确定哪一个工具或哪些工具的组合可最有效地解决潜在问题。例如，为了捕获总风险，宏观审慎政策主管部门必须监测整体性的信贷、流动性和市场风险及在某一特定部门中上述风险的累积情况，如在住房或消费信贷部门。然后，应当对上述风险进行分析，以决定哪一个政策工具可以最有效地应对这些风险。

国际合作：由于各国的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国际联系，而且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往往超出国境的范围，因此必须在国与国之间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协调与合作。国际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国外提供的信贷可加剧信贷高涨和资产泡沫。同时，通过合作也可限制国际系统性机构将业务运营转移至限制措施最少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这些机构利用一个国家来对抗另一个国家。

通过利用常见的工具及针对上述工具应用的“互惠互利”国际协议，可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一个很好的实例是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支持下所建立的动态资本缓冲机制。但是，当一些国家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根本不具互惠性标准的工具时，这该如何是好呢？对此，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答案，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这应当成为国际谈判所关注的重点。

没有灵丹妙药

即使是最好的宏观审慎政策，也不可能防止所有

的金融危机。因此，各国需要一个强有力且十分灵活的最后贷款人——通常是央行——以便缓解流动性方面所出现的临时性资金短缺现象，并采取颇具公信力的政策，解决面临破产金融机构的问题或将其关闭。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对于创建一个有助于健康金融体系的稳定环境而言，合理的货币、税收和开支政策也必不可少。

最后，决策者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如同其他任何公共政策一样，宏观审慎政策并非毫无成本，而且可能需要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之间作出某些权衡。例如，当要求金融机构维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和流动性时，决策者们可能的确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提高了信贷成本，因而可能迫使经济增长下降。对利益和成本的平衡往往需要进行艰难的抉择。■

路易斯·I. 杰克姆（Luis I. Jácome）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处长；俄尔恩德·W. 尼尔（Erlend W. Nier）是该部门的高级金融业专家。

参考文献：

Crockett, Andrew, 2000, “Marrying the Micro- 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remarks before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anking Supervisors, September 20–21 (Base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FSB/IMF/BIS), 2009, “Guidance to Assess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rkets and Instruments: Initial Considerations,” report to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Basel).

———, 2011, “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and Frameworks,” progress report to the G-20 (Basel: Octob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a,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 2011b, “Housing Fin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Back to Basics?”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Chapter 3 (Washington: Apr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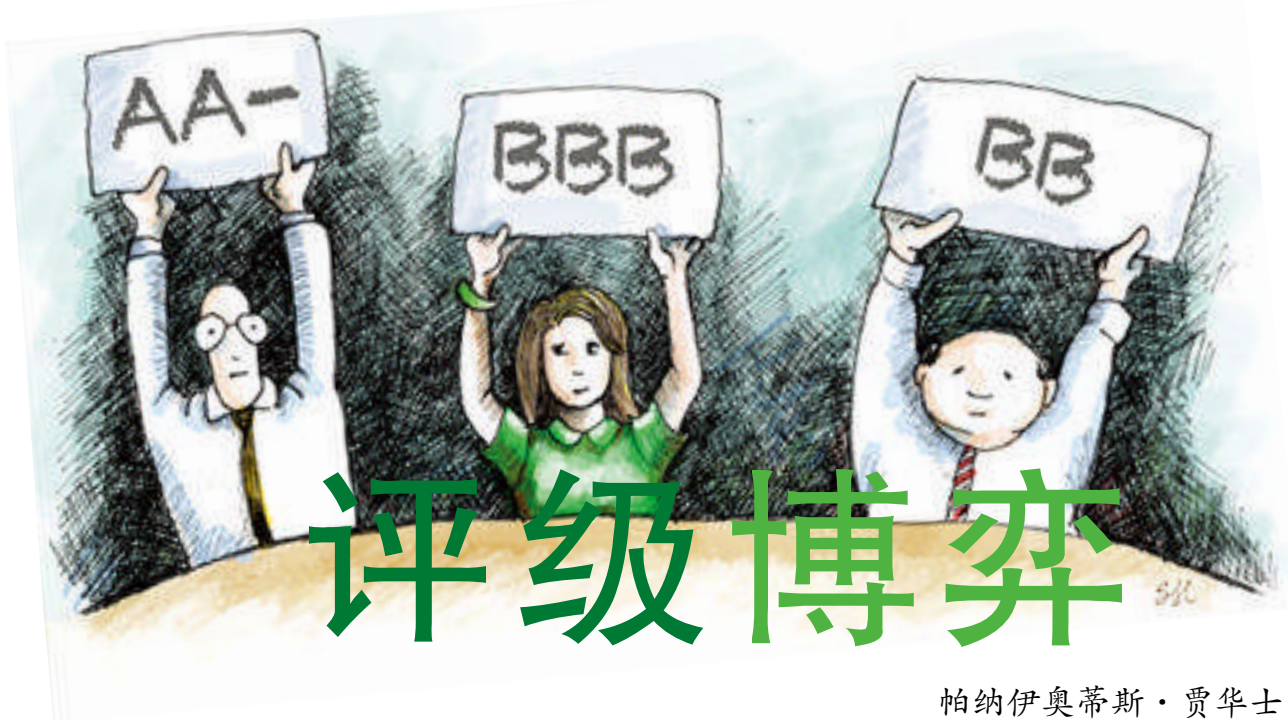
———, 2011c, “Toward Operationalizing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When to Act?”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Chapter 3 (Washington: September).

Lim, Cheng Hoon, Francesco Columba, Alejo Costa, Piyabha Kongsamut, Akira Otani, Saiyid Mustafa, Torsten Wenzel, and Xiaoyong Wu, 2011, “Macroprudential Policy: What Instruments and How to Use Them? Lessons from Country Experiences,” IMF Working Paper 11/23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errouche, Ouarda, and Erlend W. Nier, 2010, “What Caus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on the Drivers of Financial Imbalances 1999–2007,” IMF Working Paper 10/26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ier, Erlend W., 2011, “Macroprudential Policy—Taxonomy and Challenges,”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Vol. 216, No. 1, pp. R1–R15.

———, Jacek Osinski, Luis I. Jácome, and Pamela Madrid, 2011, “Institutional Models for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1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监管部门无可选择，民间信用评级大展身手，履行公共职能

帕纳伊奥蒂斯·贾华士

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成为金融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私营信用评级机构为谋求贷款和发行债券等固定收入证券的企业和政府评估信用风险。对这些机构的依赖根深蒂固，以至于有借款意向者常常必须获得信用评级才能从资本市场中筹集资金。评级可为有意向的贷款机构提供有关借款者信誉的指导，这有助于确定借款者必须为融资所支付的利率或价格。

但是，这些民间评级机构的评估本应针对民间金融市场，如今却赫然应用于公共领域——例如，全世界的监管部门都在利用这些评级来评估银行有价证券的风险水平，由此决定金融机构必须持有多少资本，以防止破产。如今，对于作为资本充足率基础的风险，监管部门日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对这种风险的评估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项公益事业。

将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见专栏1）——纳入公共监管领域产生了两种后果。首先，它改变了银行业监管的性质，从依赖静态、固定百分比的方式转变为采用动态评分的方式，评分可根据某一评级机构对信用风险的评估而有所变化。这无疑是更加先进的办法，但同时也增加了复杂性，而且也会出现不正确、过时或对其他方面具有误导性的风险评估。其次，它导致私营实体在监管中——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由公共部门发挥作用的领域——具有牢固的地

位。对评级机构进行的大多数探讨集中在利益冲突和其他与评估质量有关的问题。然而，对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谋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与其所发挥的监管功能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严重利益冲突，相关的讨论却少有提及，尽管这些机构并未主动谋求承担监管职责。

主管部门在重新审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期的监管和监督失职时，他们必须检讨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严重依赖性。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到改变所导致的成本，尽管如此，仍有各种各样的潜在途径，其中包括改革评级机构，将其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或找到其备选机构。

信用评级的发展

随着金融市场变得日益复杂，借贷机会大量涌现，贷方机构获取潜在借款者完整信息的能力也变得日益困难。借助于规模经济，评级机构可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信息服务，这些信息服务缩小了投资者对借款者的了解和借款者对投资者的了解之间的差距——给每一个借款者赋予一个等级，即所谓的评级。通过减少借款者和贷方机构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评级机构可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促进金融活动并减少成本。拥有较高（亦即更好的）信用评级的借款者通常可享受优惠条件，能以较低成本更加容易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融资，因为他们被视为风险更小且更有可能全部偿清所借的款项，包括利息。通常情况下，评级是指尽职审查流程中的初始参考点。

尽管信用评级机构为私营公司，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其在金融监管框架中的作用却在不断拓展，尤其因为各国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旨在根据银行资产风险评估其有价证券，并据此设定资本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巴塞尔协议 II”，旨在增加监管标准的细微差别（见专栏 2）。采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估的一项关键理由基于如下理念，即与根据总资产固定比率来设定资本要求的更为简单化的监管办法（早期的巴塞尔协议 I 中所确定的方法，此法较少顾及区别性对待）相比，评级机构测定信用风险的办法更加先进。

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后危机时代，有关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监管中所发挥作用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诸如利益冲突和绩效充分性等问题之上。在所提出的诸多质疑中，下述几个颇具代表性：评级机构如何赋予相应的评级；他们针对什么内容进行评定；以及评级是否加剧了危机前出现的借贷高涨并因此导致资产泡沫，且在危机发生之后引起了相反而有害的效应。上述担心不无道理，但是他们同时也着重指出，信用评级如何竟成为了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在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居然取代了尽职审查的地位，而非仅仅作为决策的补充性信息（国际清算银行，2009 年）。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是由于银行、投资基金和其他私营实体的投资战略所致。然而，主要的原因是，信用评级机构在公共政策活动中扮演着制度化的角色，尤其在银行业监管中，但在诸如确定央行

运营中的抵押品资格及政府管理或运营基金（如养老基金）的投资决策等领域也同样如此。

在金融监管中，采用机构评级不仅导致监管流程——本质上应当是政府的责任——的私有化，而且导致政府为了降低监管成本及提高效率和细微差别等所谓的利益而放弃其一项关键职责。

政府失灵

将监管责任交与民间机构可被视为某种形式的政府失灵，因为国家实际上把监管的权力让与了私营公司，而只保留了监管整体结果的责任。这种办法问题重重，其原因有多种：

- 信用评级机构的目的是促使利润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在提供可靠的信息方面具有十分强烈的动机，但是与在提供信息时肩负公众利益责任的监管机构相比，他们并没有同样的使命。当民间动机与公共使命不完全相容时，可能会发生潜在的冲突和混乱。或许会损害其中一个或两个的利益。假如公共使命受到损害，监管流程的公信力便会遭到破坏。

- 令人惊讶的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许可和监管十分有限（Katz、Salinas 和 Stephanou，2009 年）。选择评级机构的标准主要基于市场认可，而非因为其符合法定的监管要求或拥有相应的许可。评估体系和所采用方法的有效性、对评估机构的授权流程及确保问责制的监测体系均相对较弱，最多也就只有个粗略的框架。

- 即使某一评级机构享有优秀的既往业绩记录，但是其监管流程的公信力也会有被削弱的风险，因为从本质上讲，评级难免出错；他们所依赖的是主观上的判断。在市场中，假如某一评级机构的评级被人认为并不可靠，那么它便将失去客户并最终破产。然而，假如此信用评级机构是监管框架的一部分，那么它所犯的错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即便是表现不佳的会最终被罢免，只要评级机构是监管框架的一部分，它又怎么会破产呢？假如评级机构的意见导致市场发生扭曲，谁将为此负责——尤其如果最终致使金融机构手中持有的资本太少？某个存在缺陷的评级将会对依赖评级者形成误导，可能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评级机构会定期发出提示，即他们所做的评级仅仅是参考意见，不对评级融入监管的后果负责。或许，他们比政府当局更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

- 评级的变化对市场产生推动力，影响资产的价值，并由此影响资本要求。他们还影响到上述资产能否用作抵押品。从本质上讲，这并非坏事（实际上，此类变化的目的是影响风险和资产价格的评估），但是某一项改变或许会突然引发不稳定的局面，不必要地

专栏 1

三大评级机构

某些评级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评级机构主要对企业及政府所发行债务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也对投资产品进行评估，如担保债务凭证。这些机构通常会为其赋予一个评分，亦即评级，风险较小的债券，品质最高，而清偿可能性较低或根本没有清偿可能的债券的品质最低，不一而足。

在评级业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有三家公司——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的总部均在纽约市，各占全球业务的 40%，而惠誉的总部位于纽约和伦敦，在全球业务中约占 10%。全球各地也分布有小的评级机构，大多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产品的利基市场。

增加脆弱性，和/或导致资产价值的过度调整，在出现降级的时候尤为如此。随后，评级的变化可导致由监管引发的危机。此外，由于信用评级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投资者的决定主要依赖评级（如某些养老基金），所以投资者进行的尽职调查大幅减少，甚至根本不进行尽职调查。

• 由于对信用评级机构服务有需求的人对其深信不疑，因此，长期以来，信用评级机构对市场动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评级在监管中作用的膜拜无疑使其潜在的权力得以无限拓展。消费者能够对同一评级体系下的不同资产类别进行比较，同时也无需对众多信用评级机构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甄别，因此消费者将受益匪浅，也正因如此，对于由少数企业垄断的行业而言，评级进一步使其内部的竞争发生扭曲。对于用户而言，评级机构越少，反而越容易且越有优势。

况且，即使符合资格的民间信用评级机构很好地履职尽责，也始终会存在出现不当行为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因向评级机构支付费用的是潜在的借款者而非潜在的贷方机构，这样的事实会否有意或无意地对评级判断产生影响。可能出现的不当行为与任何实际的错误行为一样，都可轻而易举地损害这一流程的公信力。

前路漫漫

资本要求是整体监管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信用评级则对上述要求的确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针对监管体制的改革中，必须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功能加以考虑。至少可以采取四种改革方向。

强化监管力度：这将会涉及对现有规则的修改，但

是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角色基本保持不变。然而，监管可能会更加严格。例如，主管部门或许要求评级机构提高自己运作机制的公开性。或许还要改变其获取报酬的方式，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可能会对其收取的费用进行监管。政府可针对评估机构及其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建立更加有效的评估和认证流程，加强质量管理。可建立起投资者委员会，以请求获得相关的信用评级，这一机制将把客户和评级机构分离开来。监管者应当承认评级的易错性，并建立起可接受的准确度等级，虽然此举将在出现不准确的评级时产生有关追索补偿或赔偿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办法或所有的办法都能缓解某些问题，提高准确性和响应性，并当某个谋求有利评级的实体也在为评级而付费时，设法减少利益冲突。然而，这样的改革并不能解决民间动机和监管对评级准确性的公共使命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可能出现的不当行为与任何实际的错误行为一样，都可轻而易举地损害这一流程的公信力。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对民间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广泛的监管，使其从根本上成为公共事业。这种方法可大幅减少利益冲突，并且与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信用评级机构相比，所花费的成本也小得多。同时，它也将引发诸多问题：如何选择一个评级机构？有借款意向者是否将被迫采用某一特定机构的评级？是否将要求评级机构毛遂自荐？是否存在一个竞选流程？

公共解决方案：可将一个或多个民间信用评级机构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或在监管活动中剔除所有的民间机构，其原有的角色由一个新的公共机构来取代。新的机构将遵循一个透明且业已经过验证的评定方法。它将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支付其运营成本，但是其主要的目标并非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提供准确的信息，以优化监管流程。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可能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而且可导致其他的问题，如监管保护主义。与此同时，若要将这样的一个机构推向超国家层面的市场之中，无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并要求具备强烈的互信。

公共解决方案将会解决某些利益冲突问题，但有可能产生有关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新问题，因为这将致使国家对自己进行评级，或由国家所拥有（全部拥有或部分拥有）的一个实体对自己进行评级。而且，公共机构将必须建立起公信力，并且确保不会受到政治影响，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这无疑会导致高昂的成本，因为它涉及建立一种或多种新制

专栏2

巴塞尔协议

第一个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巴塞尔协议I，于1988年在全球10大经济体的央行行长会议上签署，旨在对国际活跃银行的监管者提供指导。

这一组织如今被称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拥有27个成员国，总部设在瑞士的巴塞尔，是独立于各国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分支机构。

该组织曾先后通过三项正式协议——均针对如何确定银行所必须维持的资本数额等问题。2004年，签订了巴塞尔协议II，而2010年9月，成员国就巴塞尔协议III——一系列综合性改革——达成了一致意见。如何实施其推荐方案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后危机时代的改革

2008年危机之后，改革所重点关注的是评级机构，尤其是位于美国和欧盟的评级机构。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以强化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解决由“用户付费”模式所导致的利益冲突问题。此项立法同时要求监管者探索新的方法，以减少对评级机构的依赖，并定期制备审核报告。

欧盟不打算减少对评级机构的依赖；相反，它在扩大监管的范围，并改变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针对认证、信息披露要求和利益冲突等项目，欧盟出台了非常严格的规则，其中包括如下提案：要求债券发行者必须每三年更换一次评级机构，而假如评级机构对此发行者10种以上的分期债务票据进行评级，则要求每年更换一次。

其他提案还包括：允许欧盟的一个监管者在“例外情况下”禁止机构发布主权信用评级，以及建立一个公共的欧盟评级机构。

度的问题。同时，它也会产生各种问题，如规制俘虏、评级易出错、不及时、道德风险及因其决定而造成政治动荡。现有评级机构的业务很可能将大幅下滑。

回归更加简单的资本规则：也可完全消除评级机构的作用，监管者可针对借款者重新实施一些预先确定的简单资本要求。这样，流程变得更加简单，从而也提高了透明性，这两者可对细微差别和技术含量方面的不足有所补偿。对监管者而言，应用和监测起来也更具可预测性和便捷性。重新采用静态比率可消除因评级变化所导致的判断误差，当然，比率的确定也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如若消除了民间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则透明性和可预测性无疑将有所改善。提高了简单性也可减少市场参与者规避监管的可能性。然而，简化的资本规则可能增加筹集资金的成本，而且可能使得一些实体更难以筹集到资金，这无疑会影响到金融活动，并可损害经济的增长。此外，由于更加简单化的规则不对各种危险进行差别性区分，因而可对银行产生负面激励作用，促使其将资金借给风险更大的实体，从而增加了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如若实施简单规则的方法，必须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测，并须与其他监管工具和指标结合使用。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对的简单性并无需建立起制度，因此这个方案在实施起来，政府的所花费的成本最低。从政治的角度看，任何重新采用简单规则的企图都意味着使巴塞尔协议 II 处于失败的境地，因为巴塞尔协议 II 支持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

与市场挂钩的资本要求：这种方法将依靠市场来

决定某一机构为了支撑某一资产而所必须持有的资本水平（Rosenkranz, 2009 年）。用于判断资产风险概况的是市场价格而非信用评级。其实，持有某一固定收入证券所需的资本数量与其收益有关。某一证券所需资本的上升与其针对某一指定基准的扩展程度成正比。市场将对风险起决定作用。

这样的一种方法将把信用评级机构从监管中剔除出去，与此同时，将保留一种先进、透明且市场友好的流程。实际上，由于市场意志常常发生改变，可以更加频繁地对资本作出调整——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变化相比，这种变化的方式更加平缓而微妙，前者常常导致突然且不稳定的活动。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有活跃且流动性强的市场，或许需要以最低和最高资本要求作为辅助手段——将其转变为一个简单资本规则选项的变体。在发生市场危机期间，当价格超过某些阈值并大幅偏离了基本价值时，额外的保护措施将要求监管者实施干预。市场可为监管者发挥导向的作用，而无需将其从监管流程中剔除出去，正如他们在依靠信用评级机构时所采取的措施一样。但是，存在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当流动性受到限制或资产的交易频率较低，从而易受到脆弱活动影响时，情况尤为如此。

必须依据所期望获得的优势——须对这种优势加以确定并尽可能对其进行量化——对每一种选项的缺陷和成本进行认真衡量。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在对自己要服用的毒药进行选择，因为总是会存在由监管所致的风险的，而且那些被监管者将总能够找到新颖的方法，以规避或破坏他们不喜欢的规则。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任何改革都必须意味着对监管进行更加广泛的改进，因为在发生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现了许多监管方面的缺陷（见专栏 3）。而且，必须对向新体系过渡所致的成本进行密切关注，因为这些费用的数额无疑将十分巨大。然而，成本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因为不作为将把政府永久地置于失灵的境地，并使金融监管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而这将损害金融部门和经济的健康，无论就单个国家而言还是就全球而言。■

帕纳伊奥蒂斯·贾华士（Panayotis Gavras）为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政策与策略部联席主管。

参考文献：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IS), 2009, "Stocktaking on the Use of Credit ratings," Joint Forum Working Group on Risk Assessment and Capital (Basel).
- Katz, Jonathan, Emanuel Salinas, and Constantinos Stephanou, 2009, "Credit Rating Agencies: No Easy Regulatory Solutions," World Bank Crisis response Policy Briefs, Note Number 8 (Washington).
- Rosenkranz, Robert, 2009 "Let's Write the Rating Agencies Out of Our Law," 2009,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p. A15.



何为银行？

银行是一个能够使存款人和借款人相匹配，并有助于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机构

珍妮·戈巴

你有 1000 美元并且 1 年时间不需要用它，你希望能够从这些钱获得收益。或者你想买一套房子，需要借款 10 万美元，30 年以后再偿还。

如果某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正好需要借 1000 美元且借款期限 1 年的借款人，或有 10 万美元空闲资金且 30 年不用的贷款人，那么他将会感到很困难。

这时银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虽然银行能做许多事情，但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有钱人手中吸纳资金（被称为存款），将存款吸收进来，并借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人。银行是存款人（将钱借给银行的人）和借款人（从银行借钱的人）的中介机构。银行为存款支付的报酬和从贷款中获得的收益都被称为利息。

存款人可以是个人、家庭、金融和非金融公司、国家和当地政府。借款人与之相同。存款能够按需支取（如活期存款）或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储蓄和定期存款）。

贷款

虽然在任何给定时间段，一些存款人要收回他们的存款，但大部分情况并非如此。这使得银行能够利用短期存款来进行长期贷款。这一过程包括“到期转换”——将短期债务（现金）转为长期资产（贷款）。银行为存款人支付的报酬少于从借款人那里获得的收益，存、贷款的利息差是大部分国家多数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

银行能够将直接在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借款作为资金来源，补充传统存款的不足。银行能够发行诸如商业票据或债券在内的有价证券，或者银行可以将所拥有的有价证券暂时借给其他机构以兑换现金，这一交易通常称为回购协议。银行还能将其账面上的贷款打包转化为有价证券销售到市场上，以获取能够重新贷款所需资金（这一过程称为流动性转换和证券化）。

银行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可能是使债权人和债务人

相匹配，但银行也是国内和国际支付系统所必需的，创造货币也是银行的重要职能。

个人、商业机构和政府不仅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存款和借款，而且需要实现资金的流转，例如，从购买者到销售者、从雇主到雇员或从纳税人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发挥了主要作用。银行能够处理从最小的个人账户支付到银行间的大额电子支付。支付系统是一个由本地、国内和国际银行组成的复杂网络，通常包括政府中央银行和能够将银行之间债务相匹配的私人清算机构。在许多情况下，支付系统能够几乎进行实时处理。支付系统还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一个运行良好的支付系统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备条件，支付系统的崩溃可能使贸易陷入混乱并极大破坏经济增长。

创造货币

银行也能创造货币。银行能够创造货币是因为它必须持有一定的准备金，这部分钱银行不能贷出。以现金或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银行存款，能够迅速转化为现金。准备金的数额取决于银行对存款人现金需求的评估以及银行监管机构的要求。银行监管机构一般是指处于国家货币和银行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的中央银行这一政府机构。银行通过将存款存入中央银行（如美联储、日本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保持所需的存款准备金。当银行将存款人存入的剩余货币贷出后，银行就创造了货币。货币能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并能够找到途径使其作为其他银行的存款而重新返回银行体系，随后能将其一部分贷出。这一重新借贷的过程能够自身重复多次，这一现象称为乘数效应。乘数的规模——从初始存款创造出的货币，取决于银行必须持有的准备金数额。

银行也在金融体系内贷出和回笼多余货币，并创造、发行和买卖有价证券。

除获取为存款人存款所付利息与从借款人或所拥

有的有价证券中所获利息之差外，银行还通过其他方式赚钱：

- 买卖有价证券的收入；
- 为客户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如活期账户、金融和投资银行、贷款服务以及发行、分配和出售其他金融产品（如保险和共同基金）等。

银行平均能够从其资产（贷款和有价证券）中获得1%—2%的收益。这就是通常所提到的银行资产回报。

传导货币政策

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是政府在没有通胀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中央银行在国家层面控制货币供应，银行促进货币在其所控制的市场的流动。在国家层面，中央银行能够通过降低或提高所要求的银行存款准备金，

很快从银行抽出资金，使得银行拥有那一小部分流动资金很快耗尽。在这样的“挤兑存款”中，银行可能不得不亏本出售其他长期和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满足客户提款的需要。如果损失巨大，可能会超出银行所拥有的资本额，导致银行破产。

本质上说，银行是值得信任或信赖的——相信银行有钱兑现其承诺。对银行的任何不信任都可能迅速蔓延，并可能导致银行的破产，甚至破坏解决问题的机制。许多国家保证银行倒闭时客户存款安全，但最近的危机表明，银行利用市场作为资金来源的比例越高，其所面临的投资者情绪驱动的脆弱性要比存款者挤兑的更大。

监管的需要

银行的安全和稳健是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政府政策旨在限制银行倒闭及其所引发的经济恐慌。在大多

银行的安全和稳健是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政府政策旨在限制银行倒闭及其所引发的经济恐慌。

以及在公开市场与作为重要交易对象的银行进行购买和销售有价证券的交易，来缩小或扩大货币供应。银行能够将更多存款作为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或增加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能够较容易转换为现金，而其价格基本不受影响），来减少货币供应。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银行准备金或流动性资产的大幅增加都将导致“信贷紧缩”，即银行贷款减少，而且由于客户不得不为稀缺的银行贷款支出更多资金，从而拉高借款成本。

银行也会破产，就像其他公司一样。但银行的破产通常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损害客户、其他银行、社会和整个市场的利益。客户存款将会被冻结、贷款关系不复存在，商务活动中用于支付工资和供应商的信用贷款限额也不得不重新制定。此外，一家银行的倒闭可能导致其他银行倒闭。

银行的脆弱性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 较高比例的短期资金，如活期存款和回购协议占全部存款总额的比例较高。大部分存款被用于提供较长期贷款，很难迅速转换为现金。

- 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
- 资本（资产减去债务）占资产的比例较低。

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能够几乎立刻要求兑现活期账户或回购协议。当一家银行被（正确或错误地）认为出现问题时，其客户担心其存款蒙受损失，可能会

数国家，银行需要特许条例来实施银行活动并应符合政府支撑机构的资格，如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贷款和提供抵押担保，以确保银行存款达到某一确定数额。银行受其本国法律和一般应服从的条规的监管。如果银行有海外业务，可能还将受其所在国法律的约束。监管者还拥有介入有麻烦的银行以最小化其影响的权力。

监管条规一般旨在限制银行面对以下风险：信贷、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整个偿付风险（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整体性保护”一文）。目前，银行比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时需要持有更多和质量更高的资产（如以留存盈余和实收资本的形式）来缓冲其损失。大型的全球性银行甚至必须持有更多资本，以应对全球金融体系失稳（也称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影响。监管条规还包括规定银行需要达到的流动性资产的最低水平，以及稳定和更长期的资金来源。

目前，监管者正在评估那些具有部分银行功能，但却没有受到和银行同样的监管的机构（即所谓的“影子银行”）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并寻求方案对其实施监管。最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此类机构的系统重要性，这些机构包括金融公司、投资银行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珍妮·戈巴（Jeanne Gobat）是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赋权于妇女 是明智的经济学

阿娜·雷文加、苏德·薛提

印度马哈莱·加尼区巴佳巴村附近稻田里的农妇。

缩小性别差距不仅能造福于妇女和儿童，而且整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在不久前，妇女们在寻求能使她们与男人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机会时，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就在约 1/4 个世纪之前，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大学教室里、在工作场所，甚至在家里还随处可见。但从那以后，全世界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改善。在大多数国家——无论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儿童越来越多地走进学校，他们的寿命也更长了，并得到了更好的工作，获得了更多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

但是，巨大的性别鸿沟依然存在。即使在富裕国家，妇女和女孩相对于男人和男孩的死亡率更高，而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则更有过之。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妇女挣钱比男人更少，更难于获得经济价值高的机会。而且，在安排生活和作出重大决定方面，妇女比男人的机会更少。

世界银行《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认为，缩小性别差距对于发展和决策来说至关重要。性别更加平等能够提升经济生产力，改善下一代人的发展后果，使机构制度和政策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即使国家发展了，在许多方面性别差异依然存在，这一事实提示我们要采取持续的、有针对性的公共行动。矫正性政策如果能针对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会产生持续的发展红利，这对于改善福利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收效，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以造成不平等的根子为标靶，同时还不能忽略国内的

政治经济状况。

参差的进展

在过去的 1/4 个世纪中，性别平等的许多方面——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经济机会的获取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变化格局。在诸如教育等一些领域，对于几乎所有妇女来说，性别鸿沟已经弥合了；但对于贫穷的或者面临诸如种族等其他不利因素的妇女来说，这方面的进展就很缓慢。其他领域性别鸿沟的弥合一直较慢，即便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妇女以及那些处于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的妇女来说也是如此。

在初等教育方面，几乎所有国家的性别鸿沟都弥合上了。中等教育的性别鸿沟也在迅速缩小。的确，在将近 1/3 的发展中国家里，目前就读中学的女孩数量超过了男孩。在可获得数据资料的国家中，有 2/3 的国家的大学女生数量超过了男生：当今世界大学生中，女生占了 51%（见图 1）。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 3500 万以上的女孩没能上学，与之比较的男孩数量是 3100 万，这些失学女孩有 2/3 是少数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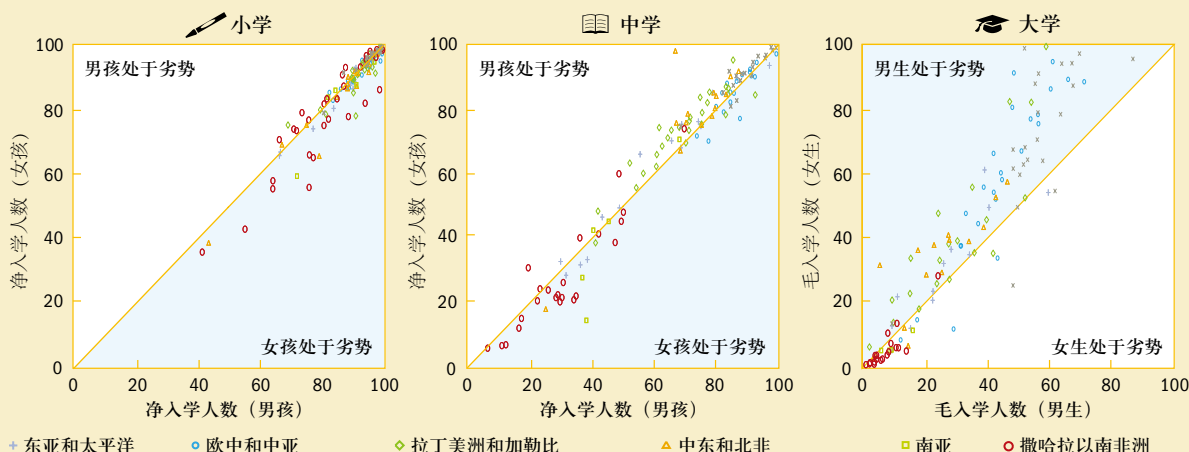
自从 1980 年以来，世界所有国家的妇女寿命都高于男人。但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富裕国家相比较，妇女和女孩年纪较轻就死亡的情况还是比男人和男孩更为多见。这种“女

图1

去上学

在小学和中学入学方面已经实现了两性相等，而高等教育入学更青睐于女孩。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每幅图中的45度线表示入学人数两性相等。高于此线的任何一点意味着入学女生多于男生。

性过多死亡”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消失”了390万60岁以下的妇女和女孩（见表）。她们中约有2/5的人未及出生，1/6的人死于幼年，还有1/3以上死于生育年龄。女性死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育龄妇女以及被HIV/AIDS流行严重摧残的国家中的妇女（世界银行，2011年，第三章）。

在过去的30年里，有5亿多妇女加入到世界劳动大军中，目前，全世界劳动者中妇女已占到40%以上。劳动参与度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妇女教育状况的改善导致的生育率的空前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在诸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家并不相同。然而，世界各国妇女挣得的收入还是不如男人（世界银行，2011年——尤其是第五章），其原因各不相同。与男人相比较，妇女可能会从事更多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农妇们耕种的土地地块较小，种植的作物也比男性农民的获利少。而且，女企业家一般是在赚钱不多的领域从事较小的营生。

至于权利和话语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目前都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然而，在许多国家，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在面对家庭决策的制定和资源安排等问题时，仍然少有发言权。妇女还更可能遭受家庭暴力侵害——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都如此。而且，在所有国家，包括富国和穷国，只有很少的妇女能参与正式的政治，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政治。

性别平等与发展

性别平等就其本身来说是很重要的。发展是扩大

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自由平等权的一个过程(Sen, 2009年)。在诸多发展事项中，缩小男女两性之间的福利差距是比削减收入贫困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还能够强化经济效率，提高其他发展成果。可以通过三个主要途径达到缩小性别差距的目的：

- 首先，由于目前全球劳动力中妇女已占到40%，在世界大学生中也占一半以上，如果能够让她们充分施展才干和智慧，将会提升总体生产力。例如，如果农妇能得到与农夫一样的土地和化肥等生产性资源，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可能会增加2.5%—4%之多（世界粮农组织，2011年）。消除妇女在特定部门或特定岗位就业的障碍能够通过提升妇女参与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产量增加，这堪与某些国家通过改善技术和才能的配置所获得的25%的增幅媲美（Cuberes和Teignier-Baqué，2011年）。

- 第二，使妇女对家庭资源（无论是她们自己挣得的，还是转付来的现金）有更大的控制权，能够使家庭开支结构向着更有利于孩子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增强一国经济增长的后劲。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英国等国家的不同例证表明，一旦妇女控制了更多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她们自己挣得的还是转付来的现金，她们会在食品和教育方面花更多的钱，孩子们也会从之受益（世界银行，2011年）。

- 最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赋权于妇女还能改变政策抉择，使得机构制度更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印度，在地方层面上赋予妇女权利催生了更多公共品，如有关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条款，这对于妇女尤为重要（Beaman等人，2011年）。

促进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家庭对市场结构和机构制度——包括正式的（如法律、规章和政府服务的提供）和非正式的（如男女的角色地位、规范和社会网络）——功能的回应，更好地理解性别平等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演化的。

市场和机构制度帮助确定家庭中不同个体所面临的激励、偏好和限制以及他们的话语权和谈判实力。家庭决定的制定、市场以及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机构制度正是以这种方式互动着，并决定着与性别相关的结果。这种架构也有助于表明经济增长（更高的收入）是怎样通过影响市场和机构制度的运作以及影响家庭作出决定，从而影响着两性的结果的。图 2 用“增长”箭头来表示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带动齿轮向着性别更加平等的方向扭转，“性别平等”箭头则显示了缩小性别差距是如何反过来刺激着更高的经济增长。

这一架构有助于证明为什么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能够缩小得如此之快。在这方面，在众多的国家中，收入的增长（通过放宽对家庭和公共经费的预算约束）、市场（通过为妇女打开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正式的机构制度（通过扩建学校和降低费用）走到一起，对家庭决定产生影响，使其更偏好于女童和年轻女性的教育。

这一架构还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妇女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性别鸿沟，尤其是那些不仅贫穷且还受到其他形式的排斥（比如居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属于少数民族，或者受伤残所困扰等等）的妇女。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尽管最富裕的 1/5 人口中，女孩和男

孩入学人数没有什么差别，但在最贫穷的 1/5 人口中，两性之间受教育年限则有将近五年的差距。危地马拉原住民中的妇女文盲率是非原住民妇女的两倍，也比原住民男性高 20 个百分点。由市场给出信号、改善机构制度提供方面的服务以及提高收入（一般情况下此举有利于女孩和年轻妇女的教育），这些举措都不能惠及处于严重不利境地的人群。

政策含义

为了实现性别平等，政策制定者需要将他们的行动聚焦于五个优先事项：减少女孩和成年女性过多的死亡；消除教育中依旧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妇女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机会，并以此改善收入和提高生产力；给予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平等的话语权；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相传。

为了减少女孩和成年女性过多的死亡，有必要对每个年龄段死亡的根本原因予以关注。鉴于女孩在婴儿和幼年时期对水生流行性疾病的敏感度较高（相对于男孩而言），改善供水和卫生设施是减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过多死亡的关键，就像越南的做法（世界银行，2011 年）。为未来的母亲提供不断改善的健康护理也非常关键，如同斯里兰卡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土耳其最近所做的那样。在受艾滋病传染影响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必须关注于扩大抗逆转录酶药物的可及性，减少新流行病例的发生。为了打击与性别选择有关的流产（它导致女婴出生数量的减少，在中国和印度北部，这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必须提高女孩的社会价值，正如韩国的做法那样。







在那些教育鸿沟持续存在、并且由于贫困、种族或者地理因素而阻碍女孩接受教育的国家，必须消除教育上的性别差距。例如，在那些距离较远成为主要问题的地方（比如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在偏远地区建立更多的学校就能够缩小教育的性别鸿沟。一旦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解决办法难以实施，或者实施起来代价高昂时，对需求方进行干预，例如根据学校出勤率有条件地实行现金转移支付，有助于让贫困家庭的女孩走进学校。在墨西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种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在提高女孩的入学率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世界银行，2011 年）。

为了扩宽妇女获取经济机会的

她们在哪儿？

2008 年，大约有 400 万女性“消失”了。

（女性的过多死亡，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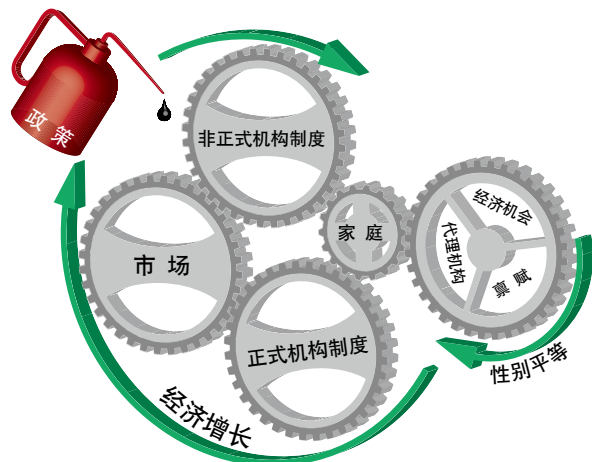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1990年	2008年
中国	890	1,092	259	71	21	5	208	56	92	30	1,470	1,254
印度	265	257	428	251	94	45	388	228	81	75	1,255	8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53	183	203	61	77	302	751	50	99	639	1,182
HIV高流行国家	0	0	6	39	5	18	38	328	4	31	53	416
HIV低流行国家	42	53	177	163	57	59	264	423	46	68	586	766
南亚 (不含印度)	0	1	99	72	32	20	176	161	37	51	346	305
东亚和太平洋 (不含中国)	3	4	14	7	14	9	137	113	48	46	216	179
中东和北非	5	6	13	7	4	1	43	24	15	15	80	52
欧洲和中亚	7	14	3	1	0	0	12	4	4	3	27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	0	11	5	3	1	20	10	17	17	51	33
总数	1,212	1,427	1,010	617	230	158	1,286	1,347	343	334	4,082	3,882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的资料估算。

图2

寻求更大的驱动力

家庭、市场和机构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性别后果。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1年，《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门路，从而减少男女之间在争取收入和经济生产力上的差距，需要制定一套联动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给妇女以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她们能够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例如，哥伦比亚的对照顾孩子给以补贴；孟加拉国的改善妇女获得信贷的渠道，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确保妇女能够获得生产性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埃塞俄比亚现在向夫妇双方颁发了共有的土地证书。有关妇女在工作场所中的生产力的信息较缺乏，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消除不利于妇女的机构制度偏向，也可以为妇女打开经济机会之门。例如，约旦引入了有利于妇女的配额方式或者实施就业安置计划。

为了消除家庭和社会事务中话语权的性别差异，有必要针对各种社会规范和信理念、妇女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法律框架以及妇女教育等问题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来制定政策。提高妇女对家庭资源的控制权的举措以及有利于增强她们积累资产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强化她们的财产权来积累资产的法律至关重要。墨西哥最近对家庭法的改革通过将婚姻期间获得财产的所有权在夫妻之间平分的方法，强化了妇女的财产权。提高女性对社会事务的话语权的方法，包括实施政治代表配额制、培养未来的妇女领袖以及扩大妇女在工会和各种专业协会中的参与度。

接近青春期的女孩和年轻的成年妇女在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性别不平等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人生这个阶段所作的抉择，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技能、健康状况、经济机会以及志向。为确保这方面的性别差异不至于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各项政策必须强调人力和社会资本建设（如马拉维的方法是直接向无论留在学校还是返回学校的女孩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使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转变简便易行（如在乌干达，对

年轻妇女实施就业与人生技能培训计划）以及帮助女孩改变志向（如印度通过让女孩接触诸如妇女政治领袖之类的角色榜样）。

尽管国内政策行动至关重要，但国际社会也能在以上各个优先领域中作出各种努力。这就要求从多个方面采取新的或更多的行动——建立一些更有融资能力的联合体，对促进创新与学习的各种努力加以协调以及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关系。融资必须直接专门用于最贫穷国家降低女童和妇女过多死亡的努力（通过投资于清洁的供水、卫生设施以及孕产妇服务）以及缩小持续存在的教育性别鸿沟。伙伴关系还必须超越政府与发展机构这对伙伴而进一步发展，把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私营部门、市民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也涵盖进来。

尽管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由于最终认识到性别平等对于男女双方都是好事，世界还是以许多方式被改变了。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弥合性别鸿沟将使我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获得许多利益。为撰写《世界发展报告》而接受调查的几千人中，有一位来自越南河内的男士评论说，“我想当今妇女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她们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工作，她们非常强大。在一些家庭里，妻子是最有权势的人。一般来说，男人仍然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妇女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夫妻之间公平合作是幸福的事。我认为，当夫妻平等时，就是幸福”。■

阿娜·雷文加（Ana Revenga）是世界银行欧洲和东亚局人类发展部主任；苏德·薛提（Sudhir Shetty）是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

本文根据《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编写。该书由世界银行于2011年出版。例证与分析参考了该报告相关章节援引的资料。

参考文献：

- Beaman, Lori, Raghendra Chattopadhyaya,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2011,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11, ed. by Suman Bery, Barry Bosworth, and Arvind Panagariy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 S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Baqué, 2011, "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 Sen, Amartya, 200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World Bank,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摆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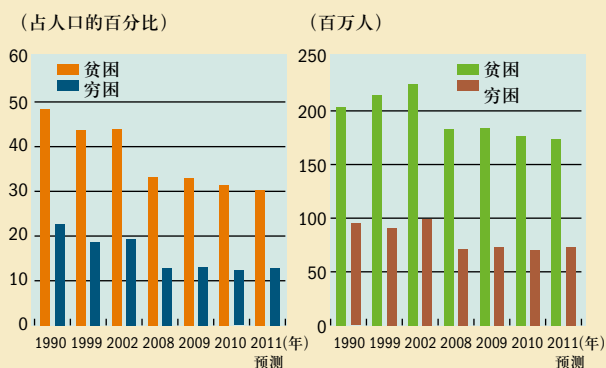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贫困率正处



秘鲁利马，人们将水装入容器中。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一项新报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48.4%降至2010年的31.4%，为2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一时期，极端贫困率或穷困(indigence, 指收入无法满足营养需求的水平)率也从22.6%降至12.3%。尽管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然而仍有1.77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中包括700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的人。该报告预测在2011年贫困率将略微下降，即使穷困率可能会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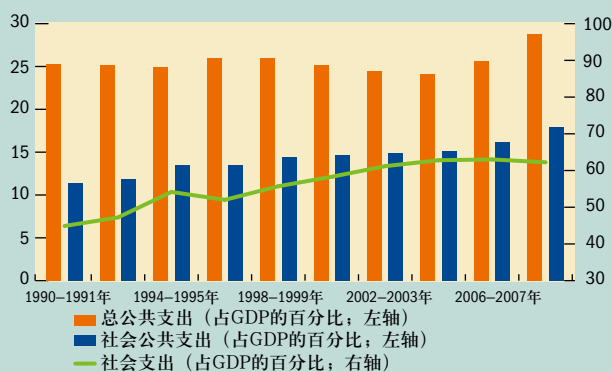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贫困率和穷困率自1990年起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注：对该地区19个国家的估计值。

拉丁美洲的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在危机期间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注：对该地区21个国家的估计值。

更好地为穷人支出

实现减贫的主要原因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工资收入、生育率的下降以及更好的社会计划。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时期所作出的降低危机对穷人影响的努力导致社会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的大幅增长。与2006—2007年相比，在2008—2009年，总公共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上升了3%，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上升了3%。在那些人均社会支出不足300美元的国家，主要的支出都花在了教育上。而仅在那些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其人均社会支出超过1000美元），更多的钱花在社会保障和援助方面。尽管如此，社会保护体系仍远远达不到具有包容性，巨大的差异依旧存在，特别是在获取社会保障方面。

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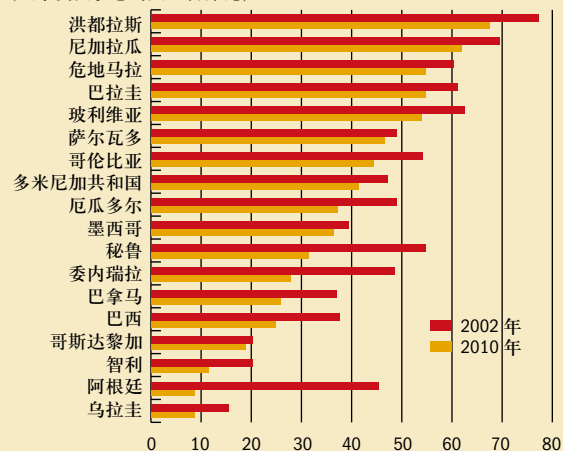
处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

聪明而有效地工作

贫困率的下降令人振奋，尤其是它发生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然而，这一进展却遭受到持续的生产力差距及劳动力市场上那些没有社会保护的低生产力部门的威胁。各国之间长久以来的差距包括生产力的不对称，以及在制度发展、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国民储蓄的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国内的不平等又进一步使该地区的减贫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减贫方面的持续进展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获得教育的水平、升级向最脆弱部门的现金转账、改革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及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保护体系。■

贫困率在各均下降，但降幅却各不相同。

(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注：对该地区19个国家的估计值。基于可获取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危地马拉农村一所学校的孩子们正在喝麦片粥。

本文由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执行秘书艾丽西亚·巴尔塞纳（Alicia Bárcena）撰写。其文字和图表基于《拉丁美洲社会全景》，由ECLAC于2011年11月公布。该报告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eclac.org。

全球土地热潮

拉巴赫·阿尔扎基、克劳斯·戴宁格尔、哈里斯·赛洛德

外国投资者 大举购买发 展中国家的 耕地

2007—2008 年暴涨的国际粮食价格掀起了一股跨国土地收购浪潮，收购这些土地的有主权财富基金、私人权益基金、农业制造商及其他食品和农业综合企业领域中的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不信任、对政治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粮食需求的投机刺激了跨国土地收购的增长。

据估计，与 15 亿公顷已开垦土地相比，全球有 4.45 亿公顷耕地尚未得到开垦（Deininger 等人，2011 年）。其中，约 2.01 亿公顷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23 亿公顷位于拉丁美洲，而另外 0.52 亿公顷则位于东欧。

2007—2008 年的价格暴涨之后，商品价格很快恢复到了较为理性的水平，但投资者对于土地的兴趣仍持续不减。1961—2007 年，每年约有 410 万公顷土地被拓展为农业生产用地，其中 180 万公顷位于非洲。仅 2009 年，就有 5660 万公顷土地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谈判。绝大部分

土地均位于非洲，总面积约合 3970 万公顷——这一数字比利比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已开垦耕地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农业属于从投资到产出耗时较长而利润又较低的产业，并且天气和微气候条件的影响将会使上述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全世界的小农场主们都不得不面临这些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场主们来说，较低的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他们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因此，一些评论家对跨国收购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领域长期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的机会，并可创造就业，给当地的农业领域引进新的技术。而另一部分人则指责跨国土地投资是“土地抢劫”，认为它忽视当地人权，以牺牲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以攫取短期效益，无视社会标准，还会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问题。2009 年，马达加斯加政府就因新闻曝光而陷入了丑闻。据称，马达加斯加政府意欲向某韩国公司无偿赠送 130 万公顷土地。我们的研究对大规模跨国土地收购的要素进行了分析，这对于对上述投资的潜在长期效应进行评估，确认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和法规对土地收购进行回应，并借助土地收购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减少贫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历史回顾

大规模跨国土地收购至少可追溯到几世纪前的领土占领和殖民扩张时期。

但通常仅小部分土地收购用于生产目的；其余土地则被闲置，禁止当地人耕种 (Binswanger、Deininger 和 Feder, 1995 年)。事实上，很多这些投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受益于在土地、劳动力（多为奴隶）和资本市场方面的补助和扭曲——其中包括本地居民土地所有权、流浪法、巨额机械化补助和市场渠道垄断方面的限制。

这些扭曲通常难以消除，并且会长时期（有时候甚至长达数个世纪）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成果 (Banerjee 和 Iyer, 2005 年)。而随后的大规模土地收购激增的原因是由于运输成本变化的驱动，例如蒸汽船和冷藏等相关费用，或是由于技术转移，使得以前经济上不可行的土地变得可以利用。

发展大型农场还是小型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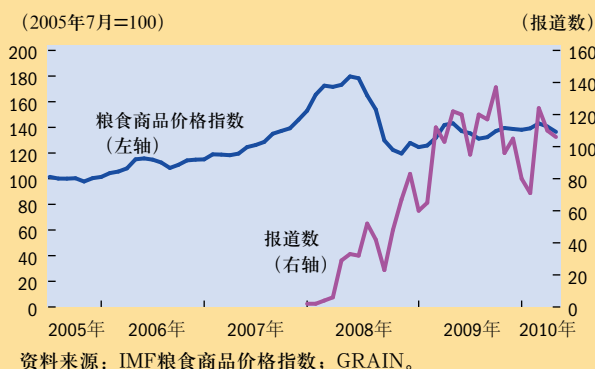
我们对大型土地交易的分析与主要发展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何种农业生产结构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并从而有利于整体发展。例如，由于更容易从中受益，因此自有经营人通常更积极去调整气候和季节的微观变化，因为他们的这一运营带来的收益会更加方便作为自我收益。与雇佣劳力运转的大型公司不同，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家族式农场在全世界最具竞争力。这些农场在很大程度上对减少贫困作出了贡献 (Lipton, 2009 年)。另一方面，尽管某些家族式农场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投资者感兴趣的土地通常在面积上远远超出一个家庭运营的规模。正如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上述大农场战略是否可行呢 (Collier, 2008 年)？2007—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时，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巨型农场表现出的出口竞争力暗示着什么样的农场结构是最佳的呢？

有观点认为，上述大规模土地模式并不一定有效。但是近期出现的大规模农场植根于谷物种植、耕种以及信息科技，这使得劳动力监管变得更加容易 (Deininger 和 Byerlee, 即将出版)。同时，这些发展可以真正减少以往大型农业运营的有关问题，并能提高从种植到食品生产的垂直整合价值链中获得的收益。以阿根廷为例，这样可令在价值链中经过较好整合的高效管理公司以高于农民自己耕种土地的价格从其手中租借土地。

但并不是所有发展都倾向于大型农场。很多科技创新并无特殊规模制约。例如，信息科技可用于对大型农场进行更好地控制，同时也可应用于小型农场，对其工作进行协调。此外，由于与小型生产单位相比，大型生产单位能够应付市场缺陷（可获得融资）、公共商品（基础设施、教育或科技）的缺乏以及较弱的政

投资风潮

2008 年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对大规模跨国土地收购报道增加，然而土地收购并未随着粮食价格的回落而降温。



府管理，因此，大型生产单位经常得到使用。但是，在一个可有效提供公共商品的竞争的、透明的环境中，运行规模较小的农场更为常见。事实上，轶事证据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大型农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其固有的科技优势，而是由于其应对市场缺陷的强大能力。

现象调查

为了全面了解全球近期对大规模土地的收购需求，同时由于很难从官方途径获得一致性的数据，我们转而查阅了大量新闻资讯。我们的样本为非政府组织 GRAIN 保存的 2008 年 10 月 1 日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出版文章，GRAIN 的所有文章均发表于名为“粮食危机与全球土地掠夺”的网站上（见 GRAIN）。该网站尽量减少下意识中的偏见，对全球的大规模土地收购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然而，我们也将这些数据与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些国家的数据信息进行了再次核对，以对上述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确认 (Deininger 等人, 2011 年)。上图显示，自 2007—2008 年粮食价格猛增之后，大规模跨国土地收购需求出现了迅猛增长，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在研究中，我们根据国际和当地新闻报道，创建了包括国外土地需求和国内项目土地需求信息的全球性国家级信息数据库。我们使用各国的潜在适用土地数量评估以及其他相关变量对上述数据库进行了补充。随后，我们使用数据库中的双边投资关系对收购国外土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识别，其中土地可用性和目标国家的农业生产潜能有望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

生态潜能

一个国家吸引新的大型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实际上

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获取具有农业潜能的未开垦土地以及获取该土地的容易程度，而该土地需要在不造成环境危害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因此，需要一种衡量方法，对当前的土地使用以及土地的潜在农业生态可持续性进行比较。过去，衡量土地的潜在农业适用性的方法受观念和技术限制。如果潜在的适用土地被森林或传统社区所覆盖的话，其大部分在提供潜在农业用地的同时，还会提供环境和社会效益，而这种损失可能会对投资的经济收益愿望带来极大的影响。

为了给某一区域的农业潜能建立一个对上述因素进行衡量的基准，我们首先将地球划分为 250 万个网格单元。随后，我们使用气候和生物物理信息（包括土壤质量），对每个网格单元在特定的农业生态环境下（如，无灌溉）的主要农业商品的最大潜在产出量进行计算（Fischer 和 Shah，2011 年）。将这些信息叠加在当前的使用土地和人口密度图层上，我们可以把已经作为农业用地的区域以及森林、保护区和人口阈值高于指定最大值的区域排除在外。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国家潜在的适宜农作区的衡量方法。使用世界市场价格对其进行估值，我们能够确定“最优”的谷物选项和该种谷物的净产值。所得的产值（未考虑运输费用）图示于地图当中。

为什么外国投资者希望购买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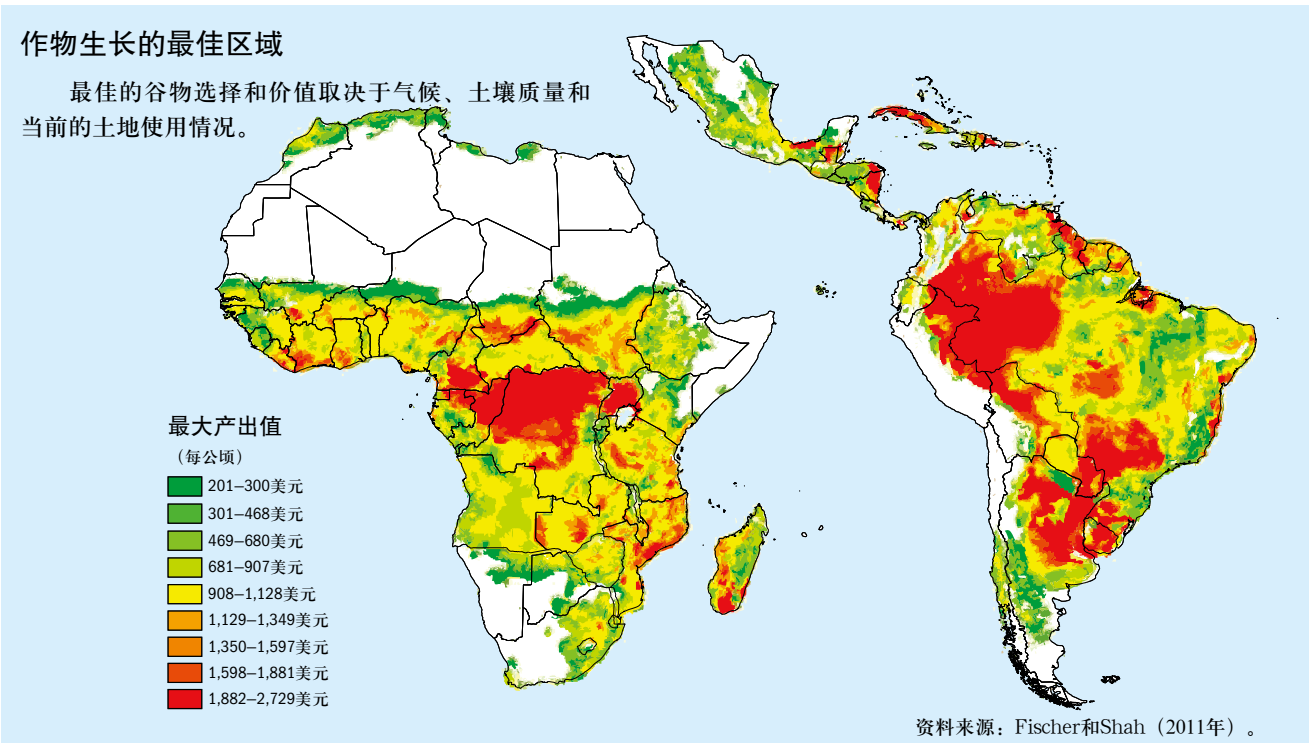
正如我们的预期，使用这些评估方法以及其他一

系列方法对双边土地交易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与具有能够形成巨大产值潜能的大量未开垦土地直接相关，这并不令人惊奇。如，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个东道主国家的潜在可耕种土地量增加 10%，将导致该国土地投资项目增加 5%。

对比当前可耕种土地的潜在产量与产量可知，在增加该块土地的产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例如，在非洲，尚没有一个大投资商感兴趣的国家的土地产量超过其潜在产量的 25%，这意味着，如果对小型持有者已在耕种的土地进行增加产量的投资，而不是耗资向未开垦土地扩张，可获益颇丰。与本观点一致，我们的研究表明，产量低但有提高潜力的国家对土地收购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目标。吸引投资者投资农业填补这些差距，并允许本地农民发展的战略可产生巨大的收益——为本地社区居民提供权利，且投资者仅需为土地支付合理的价格。但将土地潜能转换为高效农业活动却并不容易，这部分是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填补产量差距除需私人投资的努力外，还需政府支持，包括科技领域、体系和基础设施。

土地管理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只有在良好的政府管理制度下，丰富的资源才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Mehlum、Moene 和 Torvik，2006 年）。而另一方面，



石油、矿产或钻石的发掘常导致以普遍的腐败、社会两极化——甚至是暴利——为特征的“资源诅咒”，而不是全面的发展。确保财产权以及透明化的步骤以保证投资的合法性、建立法律框架以加强权力，通常被认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农业生产所需的大块土地较制造工厂更易受到攻击、偷窃和破坏，也需要更多的资金进行保护和维修，而且其开始生产（尤其是棕榈油等常青植物开始生产）所需的时间表明，上述投资对国家的投资环境特别敏感。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却与上述结论恰好相反。至少从土地投资数量上看，土地管理较差的国家（如 Institutional Profiles Database 的评价。见 de Crombrugghe 等人，2009 年）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最大。这可能是因为当现有的土地权利保护较为薄弱时，公共保护不会对投资商汇集自己的资源保护自身的财产权益造成过多阻碍，投资商可以更快、更容易地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土地。但是，这样存在的危害是投资的经济可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并且会使政府在转移土地时以远低于其自身价值的价格达成一桩糟糕的交易。

需要提高投资的透明度，建立更好的土地管理制度。

这些发现在民间团体学会引起了共鸣。这表明，这样的投资可能不会令本地居民受益。因此，需要在目标国家提高投资的透明度，并且建立更好的土地管理制度，以降低经济和社会风险。从长期来看，在吸引良好的农业投资方面，包括独立监管投资范畴在内的更好的土地管理制度可能是决定国家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展望未来

在发展中国家重新掀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收购热潮预示着这些国家有望解决多年来农业领域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科技的转移。同时，土地管理能力薄弱的东道主国家的表面吸引力将会使其投资风险凸显，这同时暗示着该国的政策和法规框架对于实现其潜能至关重要。

对大规模投资的潜在负面效应的担忧促使包括阿根廷、巴西和乌克兰在内的很多国家颁布立法草案，限制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如果外国投资者使用国籍作为掩护，上述措施几乎无法涉及根本性的问题，且通过限制竞争可能会加剧政府所面临的管理挑战。更为妥善的政策响应，如承认地方权利、教育当地居民

理解其土地的价值、他们的合法权利以及如何行使其权利等，与提高土地管理能力相比更为重要。必须深化、理解土地转移的概念，遵循基本的社会 and 环境保护措施，并确保对上述安全措施进行监管。很多国家已经宣布，在上述安全措施到位前，暂停外来者购买土地。同时，考虑到上述现象的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需与当地政府合作，采取全球性的措施以对跨国投资进行规范。这些措施应由合适的多边机构领导，并为这种不断增多的新现象提供理解和监管的经验依据。■

拉巴赫·阿尔扎基（Rabah Arezki）是基金学院的经济学家；克劳斯·戴宁格尔（Klaus Deininger）和哈里斯·赛洛德（Harris Selod）分别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拉巴赫·阿尔扎基、克劳斯·戴宁格尔和哈里斯·赛洛德撰写的IMF工作论文《全球性土地热潮的驱动根源》编写而成。

参考文献：

- Banerjee, Abhijit, and Lakshmi Iyer, 2005,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4, pp. 1190–213.
- Binswanger, Hans P., Klaus Deininger, and Gershon Feder, 1995, “Power, Distortions, Revolt and Reform in Agricultural Land Relation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by Hollis Chenery and T.B. Srinivasan (Amsterdam: Elsevier), pp. 2659–772.
- Collier, Paul, 2008, “The Politics of Hunger: How Illusion and Greed Fan the Food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6, pp. 67–79.
- Deininger, Klaus, and Derek Byerlee, 2011, “The Rise of Large Farms in Land Abundant Countries: Do They Have a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Vol. 40, No. 4, pp. 701–14.
- , Jonathan Lindsay, Andrew Norton, Harris Selod, and Mercedes Stickler, 2011, “Rising Global Interest in Farmland: Can It Yield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Benefits?”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World Bank).
- de Crombrugghe, Denis, Kristine Farla, Nicolas Meisel, Chris de Neubourg, Jacques Ould Aoudia, and Adam Szirmai, 2009, *Institutional Profiles Database III*.
- Fischer, Günthe, and Mahendra Shah, 2011, “Farmland Investments and Food Security” (unpublished; Washington: World Bank).
- GRAIN, www.grain.org; *Food Crisis and the Global Land Grab*. Available at www.farmlandgrab.org
- Lipton, Michael, 2009, *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perty Rights and Property Wrongs* (New York: Routledge).
- Mehlum, Halvor, Karl Moene, and Ragnar Torvik,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6, No. 508, pp. 1–20.

另一货币联盟剪影

在变革中发展将帮助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经受住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

阿尔弗雷德·希普克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ECCU) 是当今全球四大货币联盟之一, 尽管略有不同, 但是在许多方面, 它就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缩影。不断涌现的财政赤字、财政缺乏一体化、无法承担的债务以及来自于金融方面的挑战, 都在威胁着 ECCU 的根基。与欧元区面临的问题相同, 共同货币的持续成功取决于该地区在总体上加强财政制度和统一金融部门的监管和监督的能力。

ECCU 的成员国中有六个是独立国家, 分别是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两个成员国是英属领地, 分别是安圭拉岛和蒙特塞拉特。八个成员国均是领土面积较小的开放性岛屿经济体,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业, 特别是来自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的旅游。正因为如此, 这些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非常脆弱。

经济规模、风险共享、合理的公共服务以及在国际环境中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使得 ECCU 由于更加紧密的一体化而获得了一席之地。因其经济体的规模较小, 因此与欧元区不同, 它从地区内部贸易增长中的收益更为有限。

但是, 2008—2009 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暴露出货币联盟在架构上的突出弱点。危机导致早已高筑的公共债务不断涌现, 同时也暴露出了它在金融方面的弊端。尽管当局已经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回应, 但是由于政策的单一性和不均衡性, 很多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并不都是坏消息

东加勒比元与美元挂钩, 并依托于一种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和 low 通胀率以及相对高级的金融体系的类货币委员会制度。当银行资本为 GDP 的 200% 时, 该地区即跻身于全球最大的货币经济体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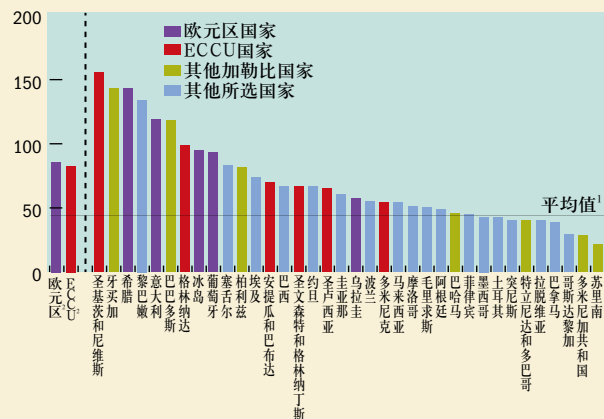
东加勒比中央银行 (ECCB) 负责货币政策, 并对银行业进行管理和监督。与欧元区不同, 类货币委员会制度限制货币政策工具和“最终贷款人”能力的使用, ECCB 的主要工作在于维护货币的外部价值; 同时, 它还负责管理共同储备基金, 并在必要时扩大政府和银行信用, 扩大额度取决于储备金总额和每个国家的限额。类货币委员会制度下, ECCB 必须拥有至少为其需求债务的 60% (主要流通货币和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储备金) 的外汇, 但在运作过程中, 需要具备 80% 的外汇储备, 不过事实上该数值已接近 100%。

除具备货币联盟和地区性中央银行外, 东加勒比地区为自由贸易区 (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完全关税联盟和共同市场)。虽然关税联盟在绝大部分经济范围内已经到位, 但是税率尚未完全统一, 且这些国家仍依赖于进口收入。作为一个共同市场, 该地区目前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仅限于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正规渠道, 不过

债务者反省

欧洲与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的平均债务基本相同; 希腊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共债务基本相同。

(公共部门债务,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0 年)



资料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与 IMF 员工的计算。

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² 加权平均值: ECCU=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克服重重困难

与希腊相类似，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公共债务为GDP的160%，成为东加勒比货币联盟中负债最高的国家以及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绝大部分债务为内债，政府极度依赖于短期融资，这使其面临严峻的滚动风险。为解决这些挑战，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多方位改革计划，以期到2020年之前，将债务与GDP的比例降到60%。

- 财政调整：该计划的基石包括新增增值税、电力税收大幅增加80%，同时采取措施抑制工资。尽管财政调整可在2016年之前将公共债务与GDP的比例减少至130%，但是债务仍将缺乏可持续，且极易受到增长波动的影响。

- 债务重组：2011年6月，政府公开宣布开始进行综合

债务重组，以期大幅减少债务。

- 担保：为了支持政府财政重组计划，加勒比发展银行同意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提供部分担保，这将极大地提高外汇借贷的成功率。

- 债转股：为了解决国家的超高的债务水平问题，政府还使用了债权转股权/土地政策。

- 稳定资金：为了保证债务重组时期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政府在东加勒比中央银行建立了特别银行储备金，以在必要时向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暂时性流动资金。

- IMF贷款：为了配合政府的经济重组计划，IMF批准了一项总额为8070万美元的、为期三年的备用协议。

它正采取措施以确保公民的自由流动。随着开放资本账户以及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地区内开始自由运营，该地区的经济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整合。尽管规模较小，但该地区已在开始为短期国债和公债建立相对稳定的地区性政府安全市场。

打造领先地位

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该地已经加快了整合速度。2010年，加勒比地区的政府首脑作出了稳定经济体并为经济的稳健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的承诺。其后不久，该地区通过了一份修订过的经济联盟条约。该修订条约将通过将某些立法权直接委任给政府首脑的方式来加强管理。此外，该地区同意设立包括从各货币联盟成员国选出的议员（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组成的议会作为地区议会的前身。这一修改过的联盟条约还指出，要整合财政政策，但是与贸易、金融和货币政策不同的是，财政政策仍旧属于各个国家政府的唯一权力范围。

欧洲的经验表明，整合财政政策极为困难，而在ECCU，该政策仍处于初级阶段。到2020年之前，实现债务与GDP的比例上限达到60%的计划将给预算政策带来巨大的趋同压力，而且这一计划已被证实是很难实现的。某些货币联盟成员国已被列入世界最大的负债国行列（见图），而且所有独立国家，除多米尼克之外，其债务与GDP的比例均已超过60%。

最为脆弱的环节

由于来自最弱成员国的跨境外溢——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跨境外溢——将使其信心低落并触发地区性经济危机，因此，共同货币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同时满足八个成员国的预算限制。

当前的高额债务问题亟需一个短期机制，以加强

财政政策。在中期，可考虑建立财政联盟或更为集中的地区性财政当局。作为第一步，各国政府于2011年宣布了年度财政目标。为解决突出的债务问题，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实施了综合财政改革（见关于圣基茨和尼维斯的专栏）。但是，其他国家必须建立更为宏大的目标，以期在2020年之前实现公共债务与GDP比例达到60%的目标；并且，当前的联盟还缺乏加强机制。

尽管ECCB负责东加勒比地区的银行监管，但是非银行金融实体的金融机构的申请和监管仍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这会导致监管套利和银行泛滥的问题。为避免容量限制和银行与非银行以及国家间的巨大外溢风险，需要一个称职的地区管理机构或监管机构对非银行业进行监管。同时，银行与非银行业监管机构之间也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协调，并加强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联合。

树立榜样

近些年来，作为确保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为稳定的金融业的一种手段，ECCU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一体化。但是持续的高额债务、金融业的挑战以及地区性政策协调方面取得的有限成绩，使得该地区较为脆弱，且可能影响该地区未来的发展信心。

但是在有力的领导下，大胆进行改革，对货币联盟，特别是财政政策和金融业，进行加强的时机已经成熟。

阿尔弗雷德·希普克（Alfred Schipke）是IMF西半球部处长。

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东加勒比经济和货币联盟（OECS/ECCU）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手册》，由Aliona Cebotari、Alfred Schipke和Nita Thacker编（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壁垒将要倒塌

阿蒂西·雷克斯·戈什访问IMF历史学家 詹姆斯·鲍顿

美籍西班牙裔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认为，“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的覆辙”。作为IMF的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致力于使该机构避免重犯以往的错误，并以其独特的幕后视角，为长期封闭和缺乏透明度而备受诟病的基金组织提供工作方式方面的建议。

IMF刚出版了鲍顿撰写的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IMF的官方历史的著作，该书是鲍顿为IMF撰写的第二部官方历史著作。《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Tearing Down Wall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0—1999*）不仅涵盖了IMF历史上的一段激烈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全球的写照。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以及前东方集团国家向市场经济体的转变。由于IMF试图解决独联体国家后继共和政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它也被卷入了这场持续的经济危机漩涡之中。与此同时，在后方的华盛顿特区，在IMF的总部，也在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内部改革。

伴随着这段最新历史的出版，IMF研究部门的阿蒂西·雷克斯·戈什与鲍顿就书中所描述的动荡时期及其作为一名IMF的官方记录人所度过的时光进行了对话。

F&D：您即将出版的新书名为《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是什么让您选择了这个名字？

鲍顿：书名的用意在于唤起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发生的大事是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产生了15个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仅有少许或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经验，在上述转型阶段，IMF应要求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这对IMF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一件大事是1994年12月始于墨西哥比索危机的一系列破坏性的金融危机，随后，这场经济危机蔓延到了东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并于1998年扩大到了俄罗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那场系列性的经济危机为IMF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工作量，并对IMF的员工及基金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是全球化的10年。国家间的壁垒、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壁垒、国家间的金融资本流限制壁垒——所有这些壁垒均开始摇摇欲坠。在这本书中，我尽量以一种能够呈现其戏剧性的方式进行描述。

F&D：据我们所知，这个时期还被称为“监控期”，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监控国家状况、观察它们的汇率来确认世界经济是否运转正常，因此IMF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您能不能简单谈一谈当时发生的情况？

鲍顿：1994年年底，当墨西哥危机爆发时，很明显IMF并没有拥有足够的数据去分析了解墨西哥当时发生的情况，这也促使IMF进行了许多自我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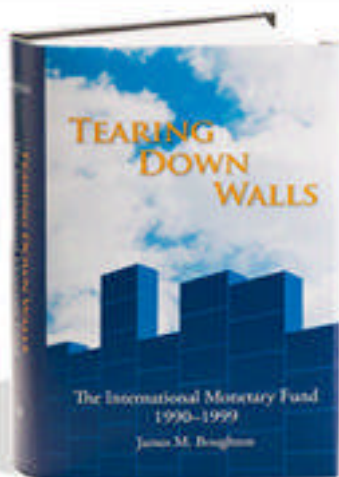
我们不得不与各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和更加紧张的合作，以便了解其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基金组织本身的整个理念变得更加透明，并且致力于鼓励国家与IMF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更为透明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成了基金组织一个主要的关注焦点。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的文化变革。

F&D：那段历史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鲍顿：正面讯息是：当上述重大挑战出现时，世界首脑会向IMF寻求援助。我认为，IMF有能力面对挑战这一说法毫无偏颇。这样说的部分证据在于，当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再次向IMF、而不是其他机构寻求帮助。

但我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却传达出一个负面讯息，那就是危机不停地出现。人们意识到经济危机不会消失，而我认为，未来我们将看到各国会反复向IMF寻求帮助。

与30年前（1981年）我加入IMF时相比，如今的IMF已经截然不同。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化的变革，





IMF 从神秘转向开放。当时 IMF 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机构，而且也更为封闭。

F&D：对于 IMF 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是个充满争议的年代，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在亚洲经济危机与拉丁美洲经济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被指责为在推动“华盛顿共识”。您是如何解读这些批评的？它们是正确的吗？

鲍顿：我认为部分批评是正确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很多时候，IMF 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也没有参与到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当中。这通常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数据。当我为撰写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是，最为著名、最为成功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IMF 首任副总裁的斯坦利·费舍尔告诉我，当他加入 IMF 时，他对基金组织员工几乎没有掌握足够多的且他希望员工掌握的当前信息而感到震惊。他以为我们了解所有的事情，而非 IMF 的员工对很多信息则根本不了解。但事实却是，没有人掌握有足够的信息。

基金组织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批评来自于亚洲经济危机。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泰国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却很难准确预测危机何时会爆发。

1997 年 7 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出席一个会议，那时我们都知道泰铢正在贬值。泰国被迫进入危机状态，并向 IMF 寻求建议。斯坦利·费舍尔当时也出席了该会议。他立刻意识到，这并不是发生在泰国的一个小小的、单独的问题，当时，他已经为 IMF 工作了将近三年。

F&D：您的书中包括很多有趣的细节和奇闻轶事，还有许多您通过查阅文献和历史事实所作的扎实的研究。您能谈谈作为一名 IMF 的历史学家的感受吗？

鲍顿：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连 IMF 都要有历史学家？”这是由于基金组织的管理层意识到，在 IMF 大楼之外的人们对 IMF 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

目睹历史

“我总认为自己站在前人的臂膀上。我看见自己正继承一项重要的传统，”作为一名 IMF 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作为 IMF 的第三任历史学家，鲍顿与 IMF 同岁。作为经济学家，鲍顿撰写了两部著作，这些多卷著作构成了 IMF 自成立至今的官方历史。

首名被委任者——基思·霍斯菲尔德发起并撰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1965 年》系列，书中描述了 IMF 的成立及其第一个 20 年的历史。

鲍顿回忆道，“当我刚从事这项工作中时，基思·霍斯菲尔德还健在，他鼓励我继续这项工作”。二人从未见过面，霍斯菲尔德退休后前往怀特岛居住，鲍顿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霍斯菲尔德之后，玛格丽特·加里特森·德·弗里斯继任，后者出版了《压力下的体系》（*The System Under Stress*）和《试验合作》（*Cooperation on Trial*）两部著作，涵盖了 IMF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晚期之间的历史。书中对导向 IMF 创建“特别提款权”的谈判过程进行了描述。特别提款权是 IMF 专署的国际储备资金；再度爆发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基金组织也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作出了响应。

鲍顿个人对这一系列书籍的首部贡献是名为《静静的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9—1989 年》（*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书中着重介绍了该时期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这些书对 10 年历史的描述从来就不是整整齐齐的，但却保持一致，鲍顿评价说，每一卷看起来“都像是连续的自然 10 年的历史”。

鲍顿建议，在《拆掉围墙》之后，下一卷最好着重对当前的全球危机进行介绍：“IMF 为何被排除在全球性机构的历史记录之外，直到危机爆发，才被邀请加入商讨危机的解决方案”。

鲍顿目前正准备退休，不过在任命下一任继任者之前，IMF 官方历史学家的位置将会空缺一段时间。在宣布继任者之前，IMF 总会允许出现一段时间的空缺，就如同历史一样（当然也包括当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只有在一段历史落幕后，才会被记录于文字。鲍顿建议说，也许是时候在 IMF 设立一个永久的具有持续性的历史学家职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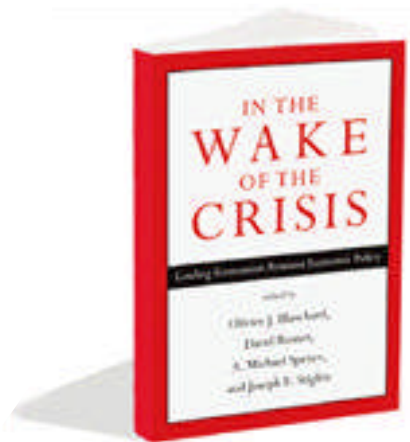
不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IMF 的员工也经常会问我很多问题。当撰写政策性文章时，人们需要了解以往所采取的措施，我也可以解释在过去为何表面上看起来应该奏效的方法却未成功。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有很多个平面。

我最享受的工作是到处去对高级官员进行采访。我结识卓越的人物，倾听不凡的故事。很难对从事这项工作 20 年来的收获进行总结，但是将其撰写为文字是无比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

阿蒂西·雷克斯·戈什（Atish Rex Ghosh）是 IMF 研究部的助理主任，《西北 19 街》（*Nineteenth Street, NW.*）的作者。

重新思考



奥利维尔·J. 布兰查德、戴维·罗默、A. 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编）

危机之后

主要的经济学家重新评估经济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2012年，174页，19.95美元（精装）。

如果有一件事应当让专家深入反思的话，这件事应当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受膨胀的资本市场、金融部门负债率过高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很少反映在大部分经济模型之中），世界深陷经济萧条之中，而对此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5年否认了房地产市场崩溃的说法，而是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从未出现全国范围的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情况”。2007年3月，他发表意见表示，“在次贷市场的问题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深远”。

预测失败后，表现出少许谦卑可能是适当的。

IMF去年3月召开会议讨论危机后的应对措施，这些会议论文被及时地收入书中。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J. 布兰查德在他的公开报告中指出，经济学家

应该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尤其是“即使通货膨胀稳定、产出缺口稳定，宏观经济下的经济状况可能仍然不会很好”。

对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这23篇文章并非一个清晰的框架，而是一系列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金融部门、资本控制、促进增长政策和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引人深思的文章。一些文章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比它们所回答的问题更多的问题，但几乎所有文章都给出了应对未来挑战的真知灼见。

接受宏观审慎的政策观点，这一人们寄予厚望的经济管理模式。如果当局能够对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保持警惕，未来的危机将能够避免（至少其影响可以减少）。但正如布兰查德所指出的，宏观审慎的政策需要更多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汇率，如调整抵押贷款最大的贷款价值比。中央银行将停止干预经济的许多不同组成要素：这种做法是否与独立的中央银行、免受民主控制的观点相一致呢？

中央银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通过量化宽松项目而成为资本市场中巨大的参与方。在量化宽松项目中，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政府证券和其他证券来将资金注入经济当中，而不是降低利率。交易者急切盼望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消息，这些新消息将成为购买债券和证券的信号。但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由于该项目已被宣布为临时性的，因而有些令人困惑。“如果政府收购债券引发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那么其随后卖出债券将导致价格下跌。”如果市场预期量化宽松政策是临时性的，那么当前的价格上涨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不这样做，中央银行随后可能会蒙受损失。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实际上，中央银行没有按市值计价的核算方

式的这一事实并未使其损失有所减少”。

关于财政政策，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罗默所主张的“我们应当考察所制定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论断，一两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可能会在吃玉米片时被噎住。帕塔萨拉蒂·肖姆考察了在何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最有效（和最无效），提出了一个有细微差别的观点；政府整体的债务和经济的开放性（税收削减可能只用于出口）毫无疑问是考察的确定因素。这里，就像别处一样，该书可能从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的卡门·莱因哈特或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涵盖八个世纪连续经济危机历史》的作者）那里获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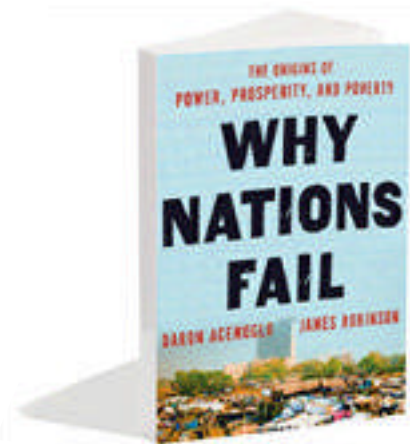
正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巨大转变（特别是IMF）可能是更愿意采取资本控制。毕竟，如果市场能够产生泡沫，那么它并非总是有效的。而且，无效的市场会使经济失稳。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的正统学说，而是向旧学说的回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贸易流动要比资本流动更重要，并据此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这个经济飞速增长的世界经济大国，也认为资本流动有助于实现广泛的经济目标。然而，欧洲的政治家们似乎非常热衷于阻碍市场的发展。

因此，印度央行前副行长拉凯什·莫汉的评论——“至少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广泛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当成为宏观经济管理标准整体工具的一部分”，将不会像10年前那样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评估危机的最好办法是保持开放思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菲利普·科根
(Philip Coggan)

《经济人》杂志梧桐树专栏作家，《纸之承诺：金钱、债权和新世界秩序》一书的作者

开始增长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皇冠出版集团, 纽约, 2012年, 544页, 30美元(精装)。

本书为那些自认为了解如何在马拉维、尼泊尔和埃及开启增长机制和繁荣或如何在希腊和意大利重启这一机制的那些正常的怀疑论者开出了一剂猛药。你是否在骨子里相信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社会将取得成功)或卡尔·马克思(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注定灭亡), 或像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和学生一样, 相信通过好的政策和支持能够具备获得“工程化繁荣”的可能性, 本书将使你再次思考。

这本书也同样值得阅读: 丰富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细节, 令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 缺少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失败。没有包容性的制度以挑战和约束政治精英(专制主义者、君主政体、幕府时代的将军、部落首领), 将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精英使用政治权利保护现状并维持“榨取”经济租金(来自于市场力量的额外收益)。人们没有任何进

行投资的理由, 也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经济能够通过榨取维持较长时间的增长, 如罗马帝国和过去30年的中国。但由于大部分国民没有承诺、被赋予权力以及缺乏进取心, 这种榨取型机制最终将难以为继——陷入内乱或被外部征服者完全击败。

这一观点得到数千年来许多事例(新石器时代幼发拉底河的那图夫人、公元前500年的玛雅城市和公元411年的英格兰)和许多地区(特兰斯凯、刚果王国、新南威尔士、阿克苏姆——现属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使故事生动的新的术语捕捉到了关键转折点: 威尼斯人委托合同、议会请愿书、黑死病、寡头政治的冷酷法律、独裁主义发展不可抗拒的魅力。

包容性体制出自何处? 为什么包容性体制伴随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在公元750年拥有28000人口的玛雅城市科潘却停滞不前); 别说那时, 就是现在也没有在加纳、秘鲁或俄罗斯出现? 为什么相对包容的罗马共和国屈服于封建专制主义? 为什么威尼斯设法实现了包容, 后来又失去了呢? 作者并没有假装提出这一过程很简单或可以预测。一些国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非常幸运; 充分的集权消除了混乱和不稳定; 多元论为工作和创造提供了动力。初始条件的较小差异与历史事件(“关键节点”)相结合导致各个社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14世纪的黑死病改变了西欧农奴的境遇, 但俄罗斯却与之不同; 大西洋贸易的崛起使得议会在英国获得实权, 但在西班牙却强化了专制和榨取型的独裁统治。荷属东印度群岛公司的垄断破坏了印度尼西亚本地的包容性制度, 但使其自身获益丰厚。皇家弗吉尼亚

公司和其同伴在17世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肥沃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稀缺使工人们拥有众多选择并发展他们自己的包容性经济和政体。

但本书并不完整, 可能是作者为写续集留有空间。作者从未定义什么是失败。作者所指的不仅是完全崩溃(塞拉利昂、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城邦), 而且是指大部分国家发展包容性体制的失败为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少数地方(如韩国和波斯瓦纳)带来较高水平的和持续的繁荣。这是一个关于水平的事, 而不是试图将制度从排斥型转为包容型。相关的时间阶段是什么时候呢?“榨取”型的罗马共和国为其广泛族群的国民提供相对较好的生活, 时间至少持续300年, 玛雅城邦甚至更长。中国“榨取型”的政治制度过去30年为数百万人民带来更长久和更好的生活, 而且在未来数十年中, 缺少包容性可能将提供更多回报。

作者认为, 最终起作用的是政治, 而不是经济(或文化和地理)。但他们有时也引用经济现实来解释政治结果。詹姆斯敦的稀缺性和欧洲黑死病造成的经济后果带来了包容性政治制度, 而不是相反。在秘鲁和加勒比地区, 这一诱因是黄金和棉花以及经济捐献, 这使权贵阶层的榨取过于容易。韩国战后良好的经济状况——一个包容性经济体系(在美国影响下的土地改革)——最终迎来了包容性政治。是否健康的全球市场压力(以及改变全球关于民主的标准、推特和脸谱网及可能包括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明智的建议)有助于推动目前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包容性经济体系进程?

作者批评了工业发展的“无知假设”。他们是正确的, 问题

不是穷国的领导者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当地的激励机制和限制因素使其不能或不愿意听从外部人员的好的建议。另一方面，可能IMF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分的“强制推行”有助于促进许多非洲国家的稳定增长。除立刻改善“榨取型”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外，获得医疗救护技术和使用移动电话、妇女运动、反对性交易、小

额信贷业的增长，甚至大肆诽谤私有化和取消农产品市场管理局等措施，也可能像阿拉伯之春一样，在发展中世界引发新一轮的包容性政治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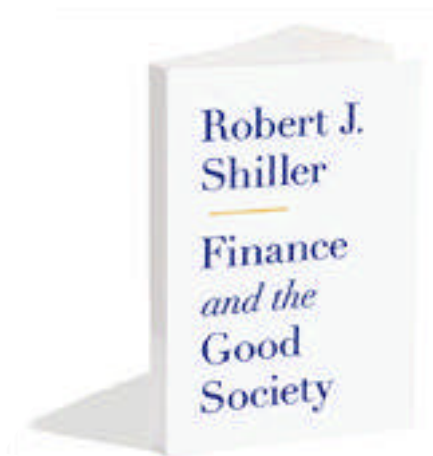
或者是否这个评论者压制了对那些本书本想激怒的正常的怀疑论者（有关在全球联系日渐紧密的世界的外部影响），并导致屈

服于天真或利己的实用主义？如果你在发展工业部门工作，如激进主义分子、学生、官僚主义者、学院、官员，请阅读本书并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南希·伯德萨尔
(Nancy Birdsall)

全球发展中心的创办者、主任

为全民融资



罗伯特·J. 席勒

金融与美好社会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2年，304页，24.95美元（精装）。

在这场危机之后，我曾作为发言人参加非洲高级金融决策者论坛。论坛上，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向这些非洲高级金融决策者鼓吹金融资本主义的优点。然而这些决策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美国曾经鼓吹金融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优点，而现在却将拥有悠久历史的公司（如AIG和房利美）国有化怎么看？

危机的附带损害不仅仅包括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剧烈下降，还有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日益增加的

敌对。在此情况下，罗伯特·席勒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有益的社会后果进行仔细分析是非常及时的。

席勒拥有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的丰富背景（他在这些领域作出了里程碑式贡献），而且他涉猎广泛，包括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行为经济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使他的金融学分析确实实现了跨学科性。

对于一个金融专家，作者将其他领域的观念融入到被具有“竖井心理”的金融专家们所普遍或分别认同的很多观点当中。

尽管这些偏离主题的内容非常吸引人（如有关“目标与我们的生活”的讨论似乎受到灵性和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有时在非金融领域作者走得太远，这使得本书的主题——保卫金融的社会利益消失得无影无踪。

席勒提出金融资本主义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需要。他的书强调了现代金融的好处，包括金融创新、市场效率、金融激励以及在风险承担者和现代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席勒认为金融业除赚钱牟利之外，还应承担更广泛职责。

作者并不反对挣钱牟利，但在他对隐藏于这种行为背后的人类本能的分析中，他认为金钱是

产生正外部性的一种途径。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就是指慈善捐助，但席勒阐明说金融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社会维度。为什么超级富豪会遭到憎恨？为什么我们会开展“占领运动”？超级富豪如何适应席勒的理想化民主金融资本主义世界？

金融业会造成过剩，但也能成为增长和减贫的引擎。

席勒的答案有时是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资本主义自我灭亡。然而席勒认为，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多年并得到了改良。而且，金融资本主义使现代信息技术得以存在，作者相信这将提高人类的能力，并加速金融民主化。

许多对抗性力量在过去数十年得到发展，这激发了对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更广泛的理念，如雇员持股计划、通过使更多人持有股票和金融资产的退休储蓄、金融监管、控制过度金融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机制等。

马克思并没有预测到类似的对抗性力量，金融民主化减少了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敌视。事实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想象超级富豪受到欢迎的情况，只要他们遵循游戏规则来获得财富。

席勒还通过研究人的本性（正面和负面的）提出金融人性化的观念，并探索如何利用人的本能来鼓励富人将其财富的积累看作是更多善举的来源。因此，虽然金融业会造成过剩，但也能成为增长和减贫的引擎。

本书宣扬增进这种社会福祉的金融资本主义。本书的目标是广泛的，途径是跨学科的。席勒是唯一适合于提供类似丰富的跨学科分析的人。

尽管本书重点聚焦于现代金融的进展，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金融体系中的众多参与者及其作用和职责。这对于那些并不是特别熟悉金融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

指南。在金融体系中，大约有 20 个级别的参与者，包括 CEO、投资银行家、律师、商人、保险公司，甚至还包括说客和慈善家。

本书以一种有益于了解特定角色的作用及其职责的方式组织编排，但我本人更希望看到本书根据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的功能进行组织，如储蓄和资本动员、信息生产、金融中介、风险分担和管理、治理。

本书还提出要大量依靠政府。作者建议政府实施一些创新计划，如关于非标准产品的期货合同。这样的建议引发了对政府重拳介入的担忧。


我还很希望看到更多有关激励措施和公司治理在促进为社会福利融资的作用方面的内容。管理层薪资水平的规模和激励特点

在当前监管争论中处于显著位置，但本书对此鲜有谈及。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归因于高管薪酬的扭曲的激励措施。

除这些不足外，本书还是相当值得一读的。虽然论题主要直观进行解释，几乎没有什么数据和复杂的方法，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的趣闻和类比，有力地鼓励读者进行横向思考。席勒不仅应当为推进金融资本民主化，而且应当为有助于金融知识的民主化而受到赞扬。

莱马·W. 森贝特
(Lemma W. Senbet)

威廉·E. 梅耶金融学首席教授、马里兰大学罗伯特·H. 史密斯商学院金融政策中心主任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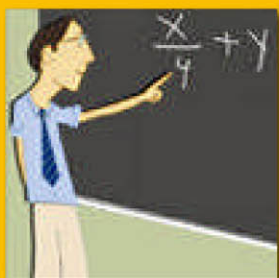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3-2014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3.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1, 2013.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读懂经济学

在我们为您提供的一站式服务点了解基础知识

目前已经登录网络：我们把所有经济基础知识汇编在一起，为学生及其他人提供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简明扼要的解释

在过去10年间，“返归基础”一直是IMF《金融与发展》的核心专栏。目前，我们对这一专栏进行了回顾、更新、修订和编辑，把所有的内容汇编在一起。我们还将把新发表在该专栏上的文章逐步增添进来，使其更加丰富。

登录

www.imf.org/fandd

点击左侧的“返归经济学基础”



您还可在facebook上找到我们：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2012 -Chinese \$8.00



MFICA2012001

